

研究論文

地景與認同形塑：以苗栗北獅潭原客聚落為例*

呂玫鏹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摘要

自然地景不僅是當今地理上的物理空間，也是不同時空中人與地景互動下的文化建構現象。本文試圖說明地景也可以是認同形塑的一種重要象徵或譬喻，筆者透過分析行動者對地景的故事敘說與記憶建構，並以居住觀點探討生活經驗中的地景感知，希望呈現地景做為地標之外，具有凝聚情感與形塑認同的功能。文中以苗栗獅潭北四村的

*本文研究感謝客委會三年期整合型研究計畫的經費補助，總計畫名為「臺灣客家族群的聚落、歷史與社會變遷」，筆者執行的子計畫為：「儀式、地景與記憶：探討苗栗獅潭的族群關係」。感謝獅潭北四村許多朋友協助本研究的進行，也要感謝獅潭村史博物館提供筆者參觀拍照的機會，並准許引用村民的素描作分析。本文初稿在計畫第三年(2010)的研討會中發表，題為「記憶、儀式實踐與生活經驗：探討北獅潭原客聚落的地景與認同」，感謝評論人詹素娟教授提供的意見。本文初稿也在清華大學人社院由吳泉源教授召集的寫作工作坊中討論，感謝吳教授及以下同仁們（依姓氏筆畫順序）的評論與建議：古明君、沈秀華、李威宜、李卓穎、林文蘭、鄭志鵬等教授，他們的寶貴意見有助於本文的修改。筆者也要感謝本文的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意見，修改時為顧及篇幅與加強立論的考量，筆者將儀式實踐一段刪除（將另文發表），著重於探討地景、記憶與生活經驗的關連，並由此討論地景與認同形塑的關係。最後筆者感謝外子黃瑞祥給予的支持與建議。當然，全文文責仍由筆者自負。

地景為例，首先探討地景與記憶的關係，追溯老地名的故事與當地人的理解，聚落名稱的歷史與集體記憶的建構，過去產業與地景的關係，以及村人對地景記憶的再製等，分析地景的故事記憶如何呈現村人所理解的地方意象。其次，討論居民的生活經驗與地景的關係，包括以風水地理概念來理解獅潭，以生活事件判斷吉地與凶地，也透過報導人對家園地景的熟悉與感知，進一步捕捉地景、家族記憶及生活勞動經驗的關係。此外，筆者透過近二十幅村人描繪的家鄉素描與訪談所得，分析村人的地景記憶與地景感知，並由此探討地景如何形塑原住民與客家人的家認同、地方認同與族群認同。

關鍵字：地景、記憶、地景與感知、實踐、認同

Landscape and Identity Formation: A Study on the Aboriginal Saisiyat Settlements and Hakka Villages of the Northern Shitan Area in the Miaoli County

Mei-huan Lu

The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natural landscape presents not only a geographical and physical space, but also entails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human beings interacting with the space during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ain that landscape can be seen as a metaphor or symbol for identity formation. Viewing the landscape as a place symbol (or metaphor) with the function of forging identity, I will focus on the actors' perspective to analyze the narrative about landscape stories, the memory construction of landscape history, and the landscape sensibility in everyday activities.

The research realm of this paper includes four villages of the northern Shitan Township, belonging to Miaoli County in northern inland Taiwan, which is the home of the present aboriginal Saisiyat people and Han Hakka people. I explore the topic of landscape and memory i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in which I analyze the narratives about the old

place names of this area, the memory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several settlements, as well as the past substantive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Saisiyat and Hakka peoples. Emphasizing the villagers' interpretations of their place image, I also review 19 drawings produced in 1999, whose sketches can be regarded as reproducing the landscape image or memory of individual homes.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aper, I then switch to analysis of landscape sensibility through villagers' activities and experience in everyday lives. Apart from the Chinese concepts of *fengshui* and *yin-yang* that still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shaping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ir village landscape as a good or bad place, accidental events that took place in the landscape also form a significant indicator for place evaluation. Most importantly, drawing on the notion of the "dwelling perspective", I re-build a person's family history and memory through his perception and narrative of his farm activity, in which he follows his ancestral labored work in the same family estate. Finally, I explicate villagers' reproduction of their landscape memory and their landscape sensibility through combining these 19 sketches with my interview data. From this, I hope to display how the landscape can be a place symbol for shaping people's identity in relation to their individual home, village place, and even ethnicity.

Keywords : landscape, memory, landscape and sensibility, practice, identity

獅潭的地理特徵是連綿相續的翠綠山巒以及溪水蜿蜒的河谷，這一帶屬於八卦力山脈與八角嶼山脈的丘陵區，高度多在五百至七、八百公尺之間，位於和興村南部的獅潭溪與桂竹林溪兩大水系分北、南方向分流，並與其他支流貫穿山巒，形成了獅潭縱谷的地形。北獅潭地區指獅潭溪流經的四個村範圍，² 歷史上大約是黃南球領導的「金捷成」墾號的區域（詳下文）。這一帶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是冬日山嵐的美景。2008年當地人致力於發展北四村休閒農業的計畫，推出的計畫書即以此地豐富的山林資源與自然美景為號召，徵集此地所有的觀光產業、商家與餐飲民宿業者，以「翠谷仙境」為題描繪北四村共同的發展願景，³ 不僅強調北獅潭具有特色的地理景觀與資源，也標舉當地寓含歷史記憶的地名故事。

筆者於 2007 年十一月初次探訪獅潭義民廟的醮儀慶典，接著三年的寒暑假均到北獅潭做田野研究，本文的研究議題來自筆者在田野當地的種種特殊經驗。田野工作初期因不熟悉路況，每當開車在崎嶇蜿蜒的山林農路時，會特別放慢速度，至第二年暑假已能在主幹道臺三線公路上以時速五、六十公里行車；然而，相較於當地人的車速常在七、八十公里以上，⁴ 我這外來的龜速車還是很容易被辨識出來。這情況在山間農路特別明顯，當地人對於地形與路況的嫻熟遠遠超過我這外地人。我曾經與原住民朋友走訪百壽村內賽夏部落的舊址，面對山路上雜草叢生幾乎看不到路面的情況，我完全得依賴他們的引領。他們對舊部落道路方向與坡度的熟悉程度令我十分訝異，因為儘管他們已經搬到山下聚落近三十年，卻好像與舊部落從未分離一樣。

² 北四村指的是百壽、永興、新店與和興等四村。

³ 「翠谷仙境休閒農業區」的原始構想是希望串連三灣與頭屋發展成「三頭獅」農村旅遊帶，以吸引遊客體驗農村多元之美。由於獅潭位在明德水庫上游保護區，水質潔淨無污染，境內有古道、山林產業與農場，近年發展的休閒旅遊資源包括貓頭鷹之家、蠶業生態園區、有機芽菜、原生魚、茶街、竹炭、山豬園及螢火蟲農場、桐花林等。

⁴ 臺三線公路上裝有測速照相機，當地人卻很清楚該在哪裡減速慢行。

筆者調查北四村的伯公祠壇，發現管理土地山林的伯公信仰很受重視，當地人對於居住地點與該崇拜的伯公有十分清楚的概念與規則。當我尋訪客家聚落位於陡峭山谷的伯公祠，引領我的八十多歲的老先生身手矯健地大步踩下陡峭的坡崁，還不時提醒落後的我可以攀附身旁的樹幹或石頭，我驚異於他的身影與路旁的一樹一石配合得如此完美，彷彿無視於腳下的陡坡彎道。這些經驗都令筆者深深感受到獅潭當地人與生活周遭的空間地景存在著緊密的關係。

然而，人與地景的關係究竟為何？我們該如何來掌握空間地景與在其上的文化建構？地景不只是地理上的空間地標，更代表著人群與文化在此空間上的刻寫痕跡。許多學者採用地景的觀點探討空間的文化建構，進一步區別不同特質的文化建構(參考 Hirsch and O'Hanlon eds. 1995; Bender ed. 1993; Bender and Winer eds. 2001, David and Wilson 2002, Low and Lawrence-Zuniga eds. 2003)，其中有將地景視為固定的地方、媒介或文類，把地景做為視覺上進一步思考與詮釋的物件；也有將地景視為交換的媒介，亦即把地景當做認同形塑的焦點。例如 Mitchell (1994) 認為地景可做為心理或認同主題的象徵或譬喻，從語意的及詮釋的角度分析實際可見的地景如何被表達在地景繪畫形式中（如風景畫），以進一步解讀其背後的心理與意識型態的意涵。⁵ 晚近探討空間的文獻均指出我們對空間的理解不能將其視為自然的地理形式而已，還需包括人為的建構環境為其基本要素及中介物，也包括所有在其上依照人的活動而有的各類建構的結果（黃應貴 1995a:3-4）。

Thomas (1993:28) 詮釋 Heidegger 的居住 (*dwelling; whonen*) 概念提醒我們：「對於人類主體而言，所掌握的世界不完全是科學與幾

⁵ 依據 Mitchell (1994)，地景畫也涉及權力關係的運作，地景畫不只是文化權力的象徵，也是文化權力的工具與代理人，因此地景得以獨立於人的意圖之外。相關研究可參考林開世 2003。

何學定義下的世界，而是以意義及重要性來衡量的世界」。空間與建築不只是圍繞我們的容器 (container) 或幾何次序 (geometrical ordering)，重點是我們居住在這些空間場所之內。居住強調人們存在於世界的方式是一種持續的感覺，並以此整合人類主體及其環境。換言之，以海德格的語彙來理解，人與其周遭空間的關係是一種維持共處的持續狀態，我們先建造了環繞我們的世界，並且我們所建造的世界也是我們居住的一部份。Ingold (2000:173) 進一步結合新達爾文主義的演化論、生態心理學理解的知覺與行動以及 Heidegger 與 Merleau-Ponty 的現象哲學，⁶ 認為三者的共通點是：生活不是對既存形式的揭露 (not the revelation of pre-exist form)，而是一個過程，且在此過程中的形式是在地方上生產與保存；更重要的，三者均認為行動者是在他的環境之中 (agent-in-its-environment)，此即為其在世存有 (being in the world)，以對比於面對一個外於他們的世界 (a world “out there”)。簡言之，此處強調的是經由居住的過程，世界對人們乃變成一個有意義的環境。Ingold (2000:186) 由此定義居住觀點 (dwelling perspective)：「指人們所建造的形式，無論是想像的或在實地土地上的，均發生在當下他們所涉入的活動之中，呈現人們與其周遭環境的實際接觸的特定的關係脈絡。」⁷ Thomas (1993:28) 認為這種居住觀點「缺乏一種人與事物之間的距離，也缺乏一種平凡的好奇，它是一種投入，既非概念化的，也非具體化的，它的發生是經由使用此世界，而不是經由觀看世界」。由此可知，居住觀點進一步整合人與空間的關係，不僅不將空間視為物理世界的外在存有，而且將空間納入人們主觀生活經驗的體驗過程中，可以說空間不僅是人與文化的建構，也包括人對其周遭環境的感知經驗。

⁶ 感謝陳侍宗教授 (Dr. Susan T. Chen, 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 Gettysburg College) 指點筆者閱讀 Ingold 的作品，使地景感知的觀點更為完整。

⁷ Ingold (2000:179) 以居住觀點是對照於建築觀點 (building perspective)，後者指的是世界的製作 (即空間) 是先於居住而存在，或是，在居住之前先製作世界。

本文著眼於地景上的文化建構與居住觀點，企圖理解並詮釋人與地景的關係。筆者一方面視地景為實存世界的物理空間與文化建構，強調人對地景的認知、生活經驗與記憶敘說，探討地景做為空間之文化建構的多重意義。另一方面筆者亦將地景當做形塑認同的一種重要媒介，⁸ 以地景與記憶、地景與生活經驗等面向來捕捉當地人的地方與家鄉認同；⁹ 並注意此地的原住民及客家人對地景是否存在記憶與生活經驗的差異，是否地景也具有形塑原客族群認同的功能。

本文研究以獅潭鄉北四村為範圍，並選擇永興村與百壽村為主要田野研究地點，除了兩村在民國四十二年以前同為一個村的理由外，主要是因為此區具有賽夏原住民新村與客家聚落區，有助於筆者實地探討日常生活中原客族群對地景的記憶與生活經驗，從而理解此地的原客聚落與族群關係。文分三部分探討：首先由歷史地景談起，追溯過去漢人進墾獅潭的歷史遺跡與記憶，探討居民如何理解與敘說老地名背後的歷史記憶，包括聚落、開墾、隘防及產業生計等，冀望從當地人對地名的記憶中理解他們對歷史地景的觀點，比較原住民與客家族群對歷史記憶的差異。其次將討論地景與村人的生活經驗，包括居民對村落地景的認知概念，如風水地理、吉地、凶地與墳場，以及相應於風水觀的實踐措施，包括個人對聚落與家戶周遭地景的特殊生活經驗。最後筆者希望以田野材料配合村人的家鄉素描，¹⁰ 綜合探討原住民與客家人對家園地景的理解、感知、記憶與再現等問題，藉此檢視地景做為認同形塑的象徵意義，以及是否存在族群差異的問題。

⁸ 雖然認同的議題在當代的討論已注意到其多重、易變與游移的性質，我們需要注意其所指涉的脈絡與內容。例如 Brubaker (2004, 第二章) 探討族群問題指出應超越認同一詞所指的單一化形式與內容，而需進一步分析與其相關的概念詞彙與指涉對象。

⁹ 本文探討的認同包括地方認同、家認同與族群認同等層面，其中家鄉認同是指以家為核心的認同，往往從自己的家擴展到附近鄰里與其他家鄉地景，如同文中引用村人素描所描繪的家。

¹⁰ 本文引用十九幅素描，個別素描作者分別列於各圖版的說明。

一、地景與記憶

人類學學者注意到地景具有時間的面向。Santos-Granero (1998) 研究南美的 Yanesha 地景與歷史發現：在史前與歷史時代，此族群因與其他族群接觸而遷移，這顯示在族人對地景的神話認知與儀式實踐上。由於 Yanesha 以地景的特徵為記憶神話故事的主體，地景不僅承載著此文化的神話傳說，可以喚起記憶，也可以在其上書寫記憶，成為記憶的一部份。他認為：如果地景、記憶與歷史意識的連結在西方文字傳統的社會具有重要性，那麼在非文字傳統的社會，這種連結會更重要（同上引：139）。然而，看似永恆不變的空間地景，實際上卻經歷過無形的時間長河在不同時代烙印下的痕跡。Ingold (1993:172) 曾經闡明這種時空之間的弔詭，他以考古學提醒我們，居住的過程基本上是暫時的或具時間性的 (temporary)，以居住觀點理解地景必須認識這種暫時性。Bender (2002: 103) 呼應這種觀點，她說地景是由人們對其周遭世界的理解與涉入所創造出來的，它們總是處在被形塑與再形塑的過程中，處在當下時刻與過程中，地景總是暫時的。地景不是一個已完成的記錄，而是一個正在進行的紀錄 (a recording)，而且這個記錄多過於人類行動者及其行動的反思，亦即此記錄是人們及其行動的創造。她認為地景可以激發記憶，也可以促進（或阻礙）行動；地景不只是一個記錄而已，因為它們總是多價與多聲的。循著過程與居住觀點來看地景與記憶的關連，Ingold (2000:147) 提出身體實踐的重要性。他說採集狩獵民族是以遵照祖先走過的路徑去打獵來記得此路徑，這其中重要的是過程必須持續，而不是對過去展演的精細複製。他認為：

因為如果世界上的知識不是在運用之前由祖先那裡獲得的，那麼記憶的對象也不能先於我們回憶的動作而存在。我們也不能將記憶之事理

解成純粹的認知運作，將已經儲存在心裡的東西喚起、再現。相反地，它是經由回想的活動，所謂的記憶才被形塑。……因此，記憶是依照每個個人在其生命過程中移動的路徑而產生（譯自 Ingold 2000:148）。

此外，Kuechler (1993:85-86)指出西方傳統視地景為可在其上刻畫的平台，因此西方傳統下所繪畫的地景（地景畫）是一種記憶的地景（landscapes of memory），用以抓住及強化個人與社會的記憶，這種記憶的地景在西方之外卻很少發現。不同於此種記憶的地景，她研究美拉尼西亞新愛爾蘭的 Malangan 木雕文化，說明此儀式器物從製作到使用具現了親屬團體及土地傳承的文化內涵，進而聯繫器物、人群及土地的關係，由此她提出了地景做為記憶的觀點（landscape as memory），強調記憶的過程，而不是記憶的刻畫，因為 Malangan 意象製造的實作及其視覺形式是隱含在記得與忘記的過程中，也因此是被記憶工作所形塑的，而不是由已存在的不同記憶所形塑。

地景與記憶的關係應視為不同的時間與空間面向的交疊，我們應細究其中每個切面的形成過程與內容意義。在此觀點下，民族誌材料所呈現的各類活動可以綜合在地景的觀點中討論（參考 Stewart and Strathern 2003: 9-10）。例如地名與地方的關係可以在相關的儀式活動與口傳歷史故事或記憶中呈現關聯，使地理上的景觀具有文化與歷史的豐富內涵，並由人們對過去的地方意象的理解，呈現人們對地景感知的社會建構與認同，或是其對歷史、發展與變遷等的不同看法。

（一）歷史地景的記憶

獅潭山區原屬於原住民賽夏族與泰雅族的區域，北獅潭主要是賽夏族的南群（張瑞恭 1987，林修澈 2000）。十九世紀六〇年代，漢人

開始向此內山地區拓墾，¹¹ 境內地貌特徵呈現過去賽夏人、平埔族人與漢人的活動遺跡，形成今日富含拓墾故事的歷史地景。事實上，漢人進駐獅潭是我們理解此區歷史地景與記憶的重要基礎，今日留存的地名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筆者感興趣的是今日的獅潭人如何理解地名背後的地景故事，他們如何去敘說與形塑地方的地景記憶，其中是否融入族群的互動經驗而形成不同的理解方式與詮釋版本？

根據黃卓權（2006：605, 608-112；2004：81-87）的研究，漢人進墾獅潭肇始於同治八年（1869），由「金福成」的股東徐讚華、楊元英、黃允明及徐捷旺等向貓閣社平埔族土目潘和泉等人承墾；三年後（1872）金福成因缺乏資金，乃召募黃南球籌組「金捷成」公號接辦，所開墾的地方約是今日北四村的全境。同一年平埔族人新港社頭人鐘合歡及鐘阿祿招請劉乞清、劉清遠、李阿苟、潘和盛、劉阿來、蟹老梅等六人，向賽夏族人承墾訂約，其墾區的四界範圍除了獅潭尾之外，幾乎與黃南球的金捷成墾號相重疊。¹² 兩股開發勢力均與平埔族人的介入有關，不同的是「新港社人是『以和平手段』佔有，而貓閣社人則是企圖透過漢人以武力佔有」（黃卓權 2006：610）。事實上，黃南球在進入獅潭之前已拓墾三灣地區，從光緒二年（1876）抱隘移防獅潭地區，至光緒九年正式取得合法的墾戶與隘守資格，其間黃南球不僅與不同開墾勢力爭奪訴訟，更重要的是以武裝勢力往內山地區推進拓墾，開啟原住民與漢人之間的鬥爭序幕。

在黃南球開墾的時代，獅潭北四村一帶至少設置九座隘寮（又稱

¹¹ 獅潭的開墾歷史參見黃卓權1988、2004、2006；筆者（2010）曾撰文整理北獅潭的歷史背景。

¹² 根據黃卓權（2006：609），金捷成的北界是今日獅潭、三灣、造橋的交界處，也包括獅潭溪下游切穿八角嶼山脈處，名為「牛門口」；新港社平埔人給墾的範圍北界是「牛嘴口水尾」，因此後者並不包括牛門口以北的獅潭尾之地，即今日百壽聚落以北的新庄聚落一帶。

「銃櫃」或「礮樓」) 與 36 名隘丁鎮守防禦。¹³ 從今日獅潭的地名仍可見過去武裝殖民的歷史痕跡, 例如百壽村十三鄰崩山下的「大銃櫃」以及永興村十鄰近上大窩的「竹銃櫃」, 其中「銃仔」是客語「槍」的意思, 銃櫃意指漢番交界處備有槍械彈藥之軍火庫, 為大規模防守據點或是隘寮駐地 (參考林聖欽 2006 : 613)。關於「銃仔」與「銃櫃」的意思, 當地的客家人與賽夏人大概都可以說得出來, 但是當筆者問到過去隘寮的確定地點, 卻幾乎沒有人可以清楚地指出, 他們通常給筆者一個模糊的老地名區域; 更重要的, 對現在的居民而言, 確定地點究竟在哪裡似乎並不重要。當年黃南球的獅潭「公館」位於今日永興村臺三線公路邊另一黃家伙房的位置, 約在新竹客運車站附近一帶,¹⁴ 佔地極廣, 一直連到東面隘防工事的竹銃櫃。¹⁵ 過去黃滿頭家為了管理龐大的墾務事業, 在今日新店村郵局建了伙房, 並設有私塾; 另外還有打鍋析伙房, 位在今日和興村派出所一帶。然而, 這幾處黃南球時代的建築今日均沒有留下任何遺跡, 至多是位置地點還存留在某些人的記憶中。比較特別的是, 永興村三鄰稱為「兵營」的地方, 位於臺三線公路霖園民宿的對面一帶, 今日設有佛堂。此處過去為黃南球的練兵場與軍隊駐紮地, 在居民的記憶中, 先後多人無法在此居住或做生意, 傳說此地過去死傷無數, 被視為「不潔淨」的地方, 直到近年佛堂設立之後才得以安居。從這幾處與黃南球開墾有關的活動地點來看, 儘管今日的居民多多少少知道這些故事背景, 確定地點並不被重視, 可見這些歷史地點與今日居民的生活沒有發生太大的關

¹³ 參考黃卓權 (2004 : 173-174, 2006 : 621-622) 的研究, 他認為至少還有兩處隘寮未被列入。

¹⁴ 黃南球離開獅潭後曾將此公館交與他人託管, 後來賣給廣東陸豐籍的黃家, 今日黃家是永興村的大家族, 曾開設永豐及秀宇廣等製茶工廠。伙房 (屋) 指客語的三合院房子。

¹⁵ 此永興大館為三合院建築, 設有正廳、事務所、客房、大穀倉、大倉房、牛欄、豬舍、大禾埕、練兵場及牢房等, 主要做為管理墾務與收租的公館。參見黃卓權 (2004) 的研究。

連，除了兵營被居民認為是不潔之地外，其他的歷史地點似乎可以輕易地隨那一代的人事一起煙消雲散。今日獅潭人仍流傳著開墾時代黃滿頭家「痾屎嚇番」的故事，事過境遷之後，黃家後人留在獅潭的只有數戶，當地人戲稱像黃家一樣有能力的人都走了，今日的獅潭人多為早期窮苦人家的後代及後來移入的住民。

（二）聚落地景與記憶

獅潭之名，一般的記載與地方傳說都指稱來自此地的自然地形，¹⁶ 傳言在今日永興村與百壽村交界處附近（約臺三線 112 公里）的一座山巒，遠望山形如同一頭獅子，獅子頭俯往旁邊的水潭喝水，所以名為獅潭。地方父老傳言，過去村民常可以聽到潭邊傳出的鑼鼓聲響，1933 年中豐公路開挖，橫切獅頸的部位，¹⁷ 據說此後鑼鼓聲響即已絕跡，1993 年省道臺三線公路開始拓寬工程，獅頭部分即被挖空斬斷，原來的獅頭山形也已不復存在。¹⁸ 在臺三線東側的坡坎下有一處山谷水潭，名為「獅頭潭」，位置在今日農路入口的「獅象橋」（連接獅山與象山）邊。筆者曾在當地人的帶領下勘查臺三線上獅頭的位置以及獅頭潭與獅象橋，雖然獅頭的痕跡已不可見，所幸還有坎下的獅頭潭及獅象橋做為地標。但是，每當來到這個地方，我的獅潭朋友總是會感嘆獅頭的地理被破壞之後，獅潭也跟著沒落了。

黃卓權（2004：91-93）認為即使獅潭有自然的山形與水潭，此地名的來源解釋是漢人入墾以後牽強附會的說法。他指出，漢人開墾之前獅潭即已得名，文獻上指稱此區的地名如「西潭」、「西潭底」或

¹⁶ 獅潭有很多依照自然地理特徵而命名的地方，例如窩、坑、潭、圳頭、水尾、上庄、下庄等。

¹⁷ 傳說當初開挖獅頸的工程很不順利，一直到灑狗血及祭拜義民爺之後，才能順利開挖。

¹⁸ 這個說法筆者除了在田野中時常聽聞之外，也見之於獅潭鄉志的記載（曾桂龍編 1998:43），以及楊長鎮（1999:36）進行「大家來寫村史」調查時期的期末報告紀錄。

「獅潭、下撈一帶地方」，因此他認為獅潭之名應由賽夏語轉換而來。林聖欽（2004：606）指獅潭與南庄地區的賽夏族人稱獅潭為 *sauwei*，意為撕破，指賽夏族人原居於南庄鄉蓬萊村，後因故搬遷至獅潭鄉百壽村，具有與原聚落斷絕從屬關係之意。然而，張瑞恭（1987：28, 37）指稱此地的賽夏族的原居地為竹南郡後龍海岸附近，並與二坪社、加拉灣社及東河社有同姓及血源的關係。筆者採訪過的此地馬陵社豆家的祖源傳說也指稱來自後龍、頭份一帶，這一說法也見於 1999 年獅潭推動村史工作坊，在一次名為「馬陵社的故事」座談會賽夏族豆鼎發先生的談話紀錄：¹⁹

...聽說我們先祖時[是]從後龍的東社、烏眉社（烏眉番，今烏眉村）經沙坪入百壽。另外有些族人是經中港溪，頭份之田寮、斗換坪等地，進入今南庄鄉之南埔，當時黃南球根本還沒來。黃南球來之後，南埔之大社分散，有的到南平背，高姓宗族原在大東勢一帶，也移到仙山及山背；另有一部份從鹽水坑到八卦力，成為泰雅族。現下馬陵社的根姓和潘姓，原來是住圳頭窩，後來一部份遷到紅毛館去了。舊馬陵社原來也叫 *bajus*，是北風很大的意思。後來稱做 *Marina*，是紀念一個人的名字，他曾勸大家別去參加日阿拐抗日，以免遭犧牲。果然日阿拐起事失敗，同行族人遭殲滅，所以我們感念 *Marina* 而用來稱呼我們的部落。我們稱獅潭是 *sauwei*，原為牛門口之地名，是族人去沙坪交換東西之出入口（當年連櫥櫃都從那裡交換扛回來），所以被擴大使用代表我們的地方。.....據我所知，（頭屋鄉的）二崗坪至今還有四家平埔族人，聽說原與我們是同族。傳說祖先住過沙坪，我們這邊的朱、根、潘、豆等姓都有這種說法。（引自楊長鎮 1999: 61-62）

¹⁹ 此為大家來寫村史活動的第十二次村史工作坊（楊長鎮 1999：60-66），於 1998 年 11 月 8 日義民廟史蹟館舉行，依據記錄，當時除了主講者豆鼎發先生外，尚有十一位北四村的村民參與。

根據王學新（2003：1582-1585）編譯日人明治二十九年（1896）的調查資料，獅潭地區的原住民主要分佈於下撈社（位於和興村東南方數百公尺）與八卦力社（位於下撈社後山），還有逐漸漢化的賽夏族（王稱為「合蕃」），散居於紙湖庄（今百壽村），向南延伸至獅潭、福興、八角林一帶，其中生番地區為大東勢社（或稱馬月社），小東勢地區則混有合番。重要的是，此時所謂的賽夏族已經逐漸漢化。大正年間的調查顯示，大湖地區的賽夏人已過著與漢人一樣的生活方式，也以漢語為生活語言，僅有崩山下社、馬陵社與坑頭社（疑為圳頭社）還保持賽夏族的風俗慣習（同上引，頁1585注十一）。張瑞恭（1987：72）的調查指出紙湖社群的賽夏三社為：*Invayus*（*Marin* 馬陵社，豆姓），*Invawan*（*Hanteu* 坑頭社，潘姓），*Karehabasun*（*Pensansha* 崩山下社，潘姓）（參考胡家瑜、林欣宜 2003：198），在日據末期（1931）為管理方便合併為圳頭社。今日住在百壽原住民新村的賽夏人均由此三社所遷出，筆者從過去的村史紀錄看到了一段記載：

Gale 女士則指出其族人大社原位於永興國小附近的高河階大竹園（今更名大坪），後來被客家人迫至神桌山石壁下而成為瑪陵社，賽夏語 *Malin* 是風很大之意（楊長鎮 1999：17）。

今日屬圳頭社的賽夏族人主要是潘姓，後來因為潘姓與漢人通婚與收養的關係，出現了甘姓與黃姓。豆先生提到圳頭社的遷移過程：

Sauwei 時代圳頭社族人原住今百壽，後來漢人築圳頭在今地，故名圳頭，但我們叫 *Inbawan*，是今日圳頭潘家之地，是放牧牛的地方（楊長鎮 1999：61）。

崩山下社原為潘斗水居住之地，他的養子黃阿添是客家人，在日據時代被授以「頭目」的封號（參考《苗栗新故鄉》2002：55-62）。今日他們的子孫有繼承黃姓者，此黃家在賽夏矮靈祭中仍從屬於潘

姓，不過因具有漢人血統，就筆者訪談所知，他們並不會主動與積極地參加矮靈祭，比較是被動地參與，非常不同於豆姓與潘姓族人。此區賽夏族姓氏除了豆姓與潘姓外，流傳著過去根姓與高姓族人的下落以及他們與客家人的關係：

豆、根、潘（等姓）何以與獅潭客家相處至今無事？因為 *Marina* 勸我們勿對抗，所以得以妥協而未發生戰事。高姓他們就不一樣了，所以後來敗走到紅毛館去了。原在百壽的根、高二姓因生存不下去，後來都走了。高姓到大東勢（今新店村），情況不好，會回來佔人家農產搶穀，故日人派出所抓過很多次。但有時勸也和。有次日人騙來喝酒後殺之，故老派出所前有個「殺人崎」，我們視為凶地，不敢住。聽說和番伯公（今和興村）即為當時漢番勸和之地。另外也[有]受刑後被丟到今大菜園深潭去的（豆鼎發先生談話，引自楊長鎮 1999：62）

其中提及的舊派出所（紙湖派出所）位於今日百壽村第八鄰伯公祠附近的河邊，曾傳說過去日本人曾在哪裡計誘屠殺賽夏人，並將之丟到附近的「沒路潭」。這個故事筆者常常聽到村民提及，相關的故事情節也見於「日人擺鴻門宴誘殺原住民杜絕出草」的記載（參考《苗栗新故鄉》2002：16-17），舊派出所一帶因而有「殺人崎」、「沒路潭」等地名，成為賽夏人的凶地。

配合獅潭開墾的背景，老地名提供我們理解過去聚落分佈的線索。²⁰ 永興村的名稱據說是黃南球開墾時為求墾業永保興盛而命名。今日百壽村的名稱來自客語的「柏色樹下」（柏樹下），據說是當年黃南球至此開墾所命名，因為在今百壽隧道附近有一株大柏樹，乃以此指稱其下的聚落，至民國四十二年與永興村分治時即以柏色樹下庄改

²⁰ 有關聚落名稱的來源，可參考《臺灣地名辭書》，卷十三苗栗縣，其中第十八章由林聖欽撰寫獅潭鄉，亦可參考黃卓權 2004。

稱百壽村。「打鍋析」指今日和興派出所一帶，據說黃南球曾經在此遭受原住民夜襲，因彈頭用盡，乃將生鐵鍋敲碎充作子彈，結果將原住民擊退的故事。「析」意指分散為碎片的意思，亦有寫做「打鍋殺」，日據時期以此地名不雅而改稱「和興」。新店村因最早設有店鋪而得名。這些聚落名稱的緣由故事當地人大多耳熟能詳，筆者初到獅潭時，當地人都會向筆者解釋這些聚落名稱與歷史的關係，大部分人也能清楚知道所指稱的地景位置。

（三）產業地景的記憶

漢人開墾獅潭其實是覬覦原住民領地內豐厚的產業利益，²¹這裡的山林以桂竹為最多，早期也有大量的樟樹，分別是製紙與焗腦的重要原料。黃南球在獅潭地區開墾即擁有製糖、製腦、製材、造紙等事業，他的糖筭位於八角林公館附近，不在北四村的範圍內。今日和興村有稱為「蔗筭跡」的地方，即與製糖事業有關。其餘製腦、製材與造紙等事業均可從北四村的地名找到遺跡。

最明顯的是樟腦事業，自晚清以來與茶、糖等同列為臺灣重要的外銷產業（參見林滿紅 1978）。獅潭的焗腦產業自開墾時代即已開始，歷經日據時期的發展與引進大鍋蒸餾的方法。百壽村有「腦寮跡」指具有蒸餾樟腦的腦灶之地，通常腦寮指的就是腦灶；「九份」指具有九份蒸餾樟腦的腦灶之地，傳統工法以一份為十個腦灶。永興村有「六份」，新店村有「三份」、「十六份」，和興村有「十九份」等。這些地名說明了此地過去的製腦事業十分發達，也是當地人津津樂道的事，甚至當地有些土地伯公祠廟的設立即源自過去的製腦時代的需求，例如永興村第八鄰三號的伯公有「樟腦寮伯公」的稱號，這段產業歷史的記憶清楚地記載在其福德祠的沿革中。即便今日製腦已經成為過去的歷史，當地的住民仍以伯公稱號或地名述說著這段過往的產業記

²¹ 本段有關產業參考黃卓權（2006：160-162），地名解釋參考林聖欽（2004）。

憶。

伴隨著製腦的是伐木與製材事業，獅潭蘊藏豐富的山林資源，開墾以來即是伐木製材的重要林地，一直到 1970、80 年代，桂竹林仍具有重要的經濟價值。永興村上大窩的客籍耆老曾向筆者訴說當年伐樟木的故事，過去山林開採沒有產業道路，所有砍伐下來的木料均需以人工搬運下山，許多八十歲以上的老一輩人均親身經歷過以木馬、拖船等運輸木材下山的經驗。

北獅潭地區盛產的桂竹與麻竹是製紙的重要原料，也有用來滷竹子的石灰與石灰窯，適於粗製紙及金冥紙的生產。百壽村六至八鄰的聚落過去稱為「紙湖」，指稱當年製紙時代用來浸泡竹子的湖塘。苗栗新故鄉協會（2002：25-36）曾經調查獅潭北四村的紙湖、石灰窯遺址（參見附錄一），並追溯相關的紙業經營者與製紙師父。獅潭首由南庄來的廖家經營製紙，買下由獅潭國小後面一直到百壽一帶三十甲的竹園，在今日百壽聚落的位置即有數個紙湖的遺址。百壽崩山下黃阿添擁有三個紙湖，雇用原住民與客家人一起經營。此外獅潭第一大紙廠是由豐原羅家經營的「共進造紙廠」，以獅潭為主要的原料地，在獅潭留下數處大東勢口所屬共進紙廠的紙湖與石灰窯地點。製紙雖非今日獅潭人的產業，不過北獅潭人仍保有這一段製紙歷史的記憶。筆者曾經試圖與百壽及永興村人走訪過去的紙湖地點，發現幾位報導人對紙湖地點的記憶已在消退之中，有的甚至已經忘記了，或許與開墾時代的地點記憶一樣，紙湖也因為與當地人的生活脫節而呈現記憶消退與遺忘的情形。

（四）地景素描與製作記憶

1999 年獅潭人楊長鎮主導村史記錄的文史工作，六月在北四村分別舉辦四場「大家來畫文化地圖」的活動（以村為單位），希望村民以簡單的方式畫出熟悉或覺得有意義的空間或地點，之後共同討論這

些地點背後的故事，形塑地方歷史的集體記憶並促進村民的交流。此活動先後有 130 多位老人家及十餘位兒童參與，並將畫作匯集成冊公開展示在村史博物館中。筆者就館內展示的七十幅村民手繪作品選擇與本文相關的部份做分析，儘管無法一一與作畫人對談（有些人已經過世），但透過筆者訪談數位作畫人，仍可一窺當地人所理解與記憶的地景。

前文提及的「獅潭公館」、「獅頭潭」與「獅象橋」出現在永興村人的家鄉素描中，如圖 1.所示。畫作以報導人自家位置為中心，畫出他熟悉的村落景點，包括歷史地點與自然地景，例如他家與山上的地理位置關係，包括永興公墓、萬善祠、土地伯公廟、鄰近住家、保安林、楓樹園、柑園與大棗樹等地景，這些地點不僅座落於永興村內，透過繪圖與討論的實作過程，加強了永興村人對村落地景的理解與共同記憶，也透露了作畫人對自家鄰近地景的理解與記憶再現。

此區自十九世紀漢人以武力拓墾，至二十世紀初即出現賽夏原住民漢化現象，原客族群關係反映在地名上，也成為獅潭賽夏人與客家人繪圖與討論的地景。圖 2.標示和興村位於福興庄與公墓之間的「吊石」與「殺番凸」（穽番嶺）地點，當地流傳這是開墾時期為防禦原住民侵擾的設計及屠殺原住民的場所；圖 3.標示出傳說中過去日人計誘屠殺原住民的「紙湖派出所」（圖中標為老派出所），位在今日百壽聚落伯公祠附近；圖 4.顯示開墾時期原住民與客家人的戰鬥地點——和興派出所（打鍋殺），後來原客和解的伯公祠地點（和番福神）以及山間古道等。這三幅圖的指涉地點是百壽村與和興村，作者有客家人與賽夏人，顯示過去的原客關係已成為村民共同的歷史記憶。然而，地景記憶的內容還是存在理解與詮釋上的差異。例如前文提及百壽村賽夏族豆先生指稱老派出所、殺人崎、沒路潭等地被視為凶地，他的解讀與過去日本人屠殺賽夏人有關；有賽夏人指稱沒路潭附近過去是老臺三線的大轉彎處，為陡峭的深谷，過去曾有死亡車禍發生，因此

成為凶地；但詢問一般的客家人，沒路潭的位置會被形容為某某人火龍果林的坎下，至於屠殺賽夏人與車禍等記憶已呈現逐漸淡化的情形。

村民對於產業的記憶明顯表現在與製腦有關的地名，例如圖 5. 與圖 6. 標示出新店大東勢的十六份、三份等地名，不過這兩幅畫指稱的焗腦產業是在日據時代，已經採用大鍋蒸餾法，並以「份」為第幾個腦寮的意思，不同於專家研究拓墾時期以一份為十個腦灶（十個鍋，或以十粒為一份）的說法，²² 呈現村民對過去歷史的不同理解與記憶。另一個與獅潭山林密不可分的是製紙產業，推動村史工作時即已透過實地尋訪紙湖的方式喚起幾乎被大家遺忘的記憶（楊長鎮 1999：111），那時候年輕一輩的獅潭人對紙湖與石灰窯的記憶並不普遍、也不深刻，只有少數地方耆老可以繪出記憶中的紙湖地點，例如圖 4.、7.、8.、19. 所呈現的湖塘位置。由此可見過去的歷史及產業，因為與現代生活關係疏遠而逐漸被年輕一輩所遺忘，透過十餘年前的村史運動與地方文史工作，刻意地尋找埋沒在荒煙漫草中的湖塘地點與碾紙輪石，或是村落與生活周遭的故事地點，重新挖掘過去的歷史故事與產業記憶，並透過共同勘查、討論、繪圖與撰文等行動，進一步書寫與形塑獅潭人的產業地景與歷史記憶。經由村史運動的過程，獅潭人再次體驗、詮釋與繪製家鄉的地景與記憶。然而，十餘年之後當筆者再次訪查紙湖的記憶，不同世代對紙湖的印象與記憶明顯有別，雖然五、六十歲以上的人還能述說著這段產業記憶與指稱印象模糊的紙湖地點，但是已褪色的紙湖記憶如同靜靜地躺在村史博物館中的家鄉素描一樣，不僅吸引不了年輕一代人的目光，反而更加速他們向外追逐繽紛的現代都市生活。

²² 參見關西金廣成文化館的網路資訊，網址 <http://jinguangcheng.pixnet.net/blog/post/29219474>

二、村落地景與生活經驗

從北獅潭居民的生活經驗來看，村落地景以 1997 年完成拓寬後的省道臺三線公路對他們的影響最大。通常交通設施被視為是開發與進步的象徵，例如 O'Hanlon 及 Frankland (2003) 研究澳洲新幾內亞高地指出殖民管理著重於交通道路的建造，一開始被視為進步與現代化的標誌，可為地方居民帶來經濟發展的機會，後來卻證明事與願違，結果助長了罪犯與敵對陣營所帶來的危險與暴力，公路也被比喻為通往婚姻之路，表示模稜兩可的未知（類似的研究，參考 Thomas 2002）。同樣地，省道臺三線公路沿著開墾時代以來即有的舊路，歷經日治時期開通與光復後的整建拓寬，目前不僅是貫穿獅潭七村的要道，也是獅潭對外聯繫的主要幹道。藉由臺三線的便利，形成百壽與永興村民的生活與鄰近的三灣及頭份地區往來最為密切。過去經由舊臺三線而來的外地遊客，偶而會在本區多做停留，但是，截彎取直拓寬為四線道之後的臺三線不但沒有為獅潭帶來更多的商機與利益，反而因為交通更為快速便捷，減少遊客在此停留的機會，也加快獅潭人向外遷移的速度。目前的臺三線已成為重型機車的天堂，每逢週末假日，清晨即出現高速疾駛而過的機車引擎聲，成為幽靜山林中的噪音，不僅擾人清夢，有時甚至入夜後還未見停歇。然而，臺三線公路在村民的家鄉素描中佔有相當高的比例，許多人以此公路做為繪製村落與家園的重要地標與相對位置關係，特別是這條公路見證了過去至今獅潭的發展與滄桑，它的脈動流向與村民日常生活的韻律與經驗緊緊相連。例如圖 7 與圖 9 畫出和興村與百壽村舊臺三線與新臺三線的相關位置，顯示村民認知的家鄉地景與它的緊密關係。筆者曾與村民走過百壽隧道附近的舊臺三線路段，今日雖非主要的交通幹道，但仍為村民來往的通路，無怪乎已經廢棄不用的公路，仍活生生地呈現在村人的家鄉素描畫中。

事實上村民所描繪的村落地景，往往反映其生活周遭的人事物，其中不僅呈現作畫者社會關係的網絡，也表現其熟悉的生活領域與經驗。筆者從圖 11.看到村民所畫的六份庄，不僅呈現小聚落內田、園、窯、水潭與道路的空間位置關係，標示出老地名、伯公祠與活動中心等標，也清楚的畫出家屋位置與鄰居姓氏，甚至每一家主人的姓名，其中也包括繪圖人熟悉的往生者，展現作畫人對其生活領域的熟悉與情感。類似的情形也見於其他的畫作，其中圖 15.除了記錄上大窩一帶住家的空間分布與家長姓名外，特別標示「木馬道」，並以文字說明大窩山在民國四十年代從事伐木的開發產業，當年約有一、兩百人參與拖木馬搬運木材下山的工作。筆者訪問繪圖者，他親身經歷過拖運木材的辛苦工作，見證了伐木製材產業從過去以來的更迭與辛酸，過去山林工作的艱苦是他一生的勞動經驗所無法忘懷的記憶。圖 12.、13.及 14.標示出民國二十四年中部大地震在永興村留下的痕跡，三幅素描標示地震造成的溪流與突起四米高的位置。那一次震央在關刀山附近的大地震是老一輩獅潭人的惡夢，當年獅潭有四十五人喪生，新店街上最大的店商蘇家也在地震中全毀（苗栗新故鄉協會 2002：68）。這個大地震不只是老一輩人的親身經驗，中年的獅潭人也清楚地震造成的地景變化，筆者曾在他們的帶領下走訪地震所留下的痕跡。可見每一幅素描刻畫的是作者熟悉的地景與生活經驗，也反映獅潭人對地景的理解與記憶。

地景與生活經驗脫離不了民間盛行的風水概念及其運作。²³就獅潭整體的風水地理而言，具有客家代表性的義民廟是村民最關心的焦點。獅潭義民廟建於 1907 年，開墾時代黃南球為了安定民心，乃至新埔迎請義民爺到獅潭供奉，並獻地建廟。廟宇建築曾毀於民國二十

²³ 人類學有關風水的研究很多，參見葉春榮 1995，1999；林開世 2007；林瑋嬪 2009；Bruun 2003，Freedman 1969；Feuchtwang 2002。

四年的大地震，二十七年重新啟建，民國五十年改建拜亭，並於民國八十三年改建成今日兩層樓的建築，將二樓做為廟堂，一樓做為活動中心，提供村民多功能使用。村民最常津津樂道的是有關義民廟風水的傳說故事。一為義民廟採座南朝北的罕見座向，據傳是當年的黃滿頭家為了壓制開墾的另一股勢力，即來自後龍新港社東社的劉姓道卡斯族人（其族裔今日仍居獅潭新店村），原祖墳位於今日加油站後方。傳說因為義民廟的廟門朝北，正對著劉家的墓塚，致使劉家後來家運中落，人口搬遷。²⁴二為義民廟的廟地風水，許多在地人指出改建後的義民廟並沒有為獅潭帶來更好的發展，反而是加速人口外流的速度，²⁵使已存在的問題更形嚴重。依據當地地理先生的看法，目前的義民廟不是可以聚集靈氣的建築，因為廟的東邊為繁忙的臺三線公路，西側緊鄰獅潭溪，後方也無山巒屏障，所以氣容易向四方散洩，造成今日獅潭人口不斷向外遷移的結果。相對的，位於新店村仙山上的靈洞宮與協雲宮，因地處吉地，乃成為靈氣匯聚的靈山聖所，加上仙水治病的神蹟故事吸引許多外地慕名而來的信徒與遊客，成為今日獅潭旅遊的招牌，也是地方上最知名的文化地景。

對百壽村與永興村的居民而言，他們除了共享與其他北四村居民一樣的地理傳說與生活經驗，他們對生活周遭的「凶地」或「污穢的地方」，存在獨特的一些故事與經驗。首先，筆者常聽村民提及百壽村的沒路潭（即前文提及過去日人殺原住民的棄屍場所）與永興村的兵營，這些歷史地點傳說在過去有許多無辜的死者，因此被村民認為

²⁴ 開墾時代漢人均透過平埔族人進入獅潭山區，黃南球結合的是苗栗貓閣社，此處劉家是後龍新港社，義民廟的建置也可以看出開墾時代不同勢力的鬥爭情形，參考楊長鎮 1999:15。

²⁵ 根據獅潭鄉戶政事務所 100 年 11 月底的人口統計資料，獅潭鄉七村人口總計只有 4831 人，北四村人口情形依百壽村、永興村、新店村、和興村的順序分別為 430, 671, 1074, 693 人。民國 55 年 12 月總計全鄉人口有 11560 人，至 70 年 12 月 8596 人，至 80 年 12 月 6500 人，至 90 年 12 月 5159 人，明顯的呈現逐年減少的情形。

http://www.miaoli.gov.tw/Shihtan_Household/index.asp

是不潔之地，也是當地人不敢任意接近的地點。第二類不吉之地是臺三線公路上的交通事故頻發地點，主要有兩個地點。一在第八鄰伯公祠後方陡峭山壁與河流深谷處，這是過去老臺三線必經的大轉彎地點，因為曾經發生車禍致使人丁跌落山崖死亡，成為村人平時卻步的地方。二在永興村黃家伙房附近的臺三線公路大轉彎的路段，近年來發生多起車禍事故，數年前永興村特別舉行超渡法會，希望能藉由法會儀式潔淨這些事故地點，保持村落安寧的居住空間。第三類村人熟知的不吉之地，多為發生意外死亡的事故地點，導致村人相信這些地點是鬼魂出沒的地方。第一個地點是由永興村往百壽隧道處附近一處極深邃的山谷，據說過去有人溺斃於此，後傳出有人撞見女鬼，成為村人迴避單獨夜行的不吉之地。其他兩個地點也傳出鬼魂出沒的事情，一個是發生在永興村第五鄰臺三線公路邊的大水潭，另一個是發生過凶殺案並棄屍在永興臺三線公路旁的水溝。以上三類地點被視為污穢與不吉之地均與意外死亡事故相關，符合一般民間信仰以不正常死亡的場所為不潔之地的說法，而這個邏輯也可以變成：常常發生事故的地點，大概也存在著不正常的理由。例如永興村名為「大艮」的高地，為相當陡峻的山坡柑橘園，由於主人在此工作常常意外受傷，他深信是此地不好的東西作祟所致。這些故事均能指稱獅潭村民對其村落地景的認知與理解，往往是透過事件來聯繫。村民的理解仍不離陰陽五行與鬼魂的觀點，雖然山林中不乏許多被認為陰氣太盛或有鬼火出沒之地，甚有村民家園就在公墓附近，但一般村人認為只要人住久的地方，陽氣就會興盛，也可以用儀式處理的方式解決陰氣的問題。

風水觀念在日常生活運用最多的是個別的家屋與墳塋。一般說來，獅潭大多數人家的住宅沒有特別講究風水地理，往往僅能順從地勢與環境做趨吉避凶的措施，主要是因為家宅位置與建置方式往往得受限於自然環境與經濟的條件。儘管如此，許多人仍會運用風水觀念做最有利的空間位置安排，或請地理先生協助尋訪好的陰宅風水。誠

如林開世（2007）的研究揭示，風水是一種空間實踐，著重在有限條件下的選址。筆者一位報導人的房子建造於臺三線路邊的高崖之上，公路對面即是下陷的深崖，這在風水上是不好的，但是位處臺三線路邊具有相當好的商機，他乃在公路對面造鐵皮屋，以迴避面對深淵坡崁的不利之地，結果讓他的商店經營十分成功。家屋風水的好壞也往往藉著人世間的實際成就來評價。一般公認獅潭比較好的家屋風水地應屬永興的黃家伙房，目前伙房主體改為兩層建築，背倚山巒，遠望有連綿的山巒溪水環繞，視野相當開闊。由於永興黃家擁有三位鄉長，族人職業大多數是公務人員及老師，家族的興旺與成就成為應驗好風水的說法。不過近年因為臺三線公路的拓寬，伙房的前庭被削去一大半，黃家人表示這多少會影響居住空間與風水。相對於家宅的風水，村人對於祖先墳塋的風水更為重視。有村民表示，近年來此地架設太多的高塔基地台，在整體上影響村民的祖墳風水。前述的商家報導人表示，墳墓選址需要找風水先生，他也不例外，不過一般人選擇墓位都避開高塔、電線杆或屋頂斜角等易犯沖煞的位置。可見風水對獅潭人是重要的，不僅希望所居之地與山林景觀取得和諧，也希望祖先墳墓盡量避開沖煞的威脅。

筆者曾在永興村長的帶領下調查一座擁有超過一百二十年歷史的伯公祠（八鄰三號），要到達此處必須走上大窩的產業道路，直達最高處的頂端，目前只有三戶住家。住在伯公祠旁邊的陳姓報導人，在離鄉定居臺北二十多年之後，因職業造成的疾病，返鄉休養，目前以高級水果及桶筍為業，將山產直接銷售到臺北的市場，經常往返於獅潭、臺北兩地。他說家鄉才是他覺得最舒適的地方，不僅有好山好水與好空氣，更重要的是一種生活的安定感，儘管抵達他家的產業道路一直到 2008 年才有水泥路面，他卻對此地的生活感到相當充實與滿足。報導人的家距離獅潭國小約有五公里的山路，小時候一趟上學的路程需要一個半小時，當時他與鄰近的小孩一共九人，常常一起結

伴同行、邊走邊玩，也踏遍每一條可以行走的路徑，成為今日美好的童年回憶。因此，他不僅對家鄉山林的一草一木相當有感情，也對山林間四通八達的鄉間小路相當熟悉。報導人的曾祖父在 1907 年從珊珠湖移入獅潭上大窩現址附近，傳襲至報導人的兒子已有五代，因地震震垮了屋舍，陳家換過兩次家屋地點，都在現址附近，屬於同一個伯公的轄區。他帶領我們去看他的田園，並一一細數陳家過去所從事過的山林產業。他現在擁有的山林田園是陳家在民國四十年代首次購買的土地，在此之前一直是佃農的身份。他的田園主要種植柑橘、火龍果與桂竹，也有小部份栽種其他蔬果。他說獅潭可以從事的任何山林產業與工作，陳家都經歷過。第四代的報導人種植有機火龍果與柑橘，採取現代的種植技術與經營方式；他父親的時代，主要從事種茶、砍竹與梯田種稻。他突然指出屋旁的一株植物，客語稱做 *chuu-e* (苧麻)，告訴我們這是他家第二代（祖父）時期的主要作物，這種植物曬乾之後具有很好的韌性，可做繩子使用，也可以賣錢，在那時代曾經大量栽植。報導人參與整理屋旁的伯公祠歷史沿革，稱此為「樟腦寮伯公」，因為這裡過去是製腦的地方，推測陳家第一代人遷移至此應是為了從事焗腦的工作。報導人對其家園、山路及田園作物如此的熟悉，從自己田園作物感受到父祖輩以來山林農事的更迭變化，以家屋旁尚存活的苧麻記憶著上輩父祖一代的工作，以伯公祠的歷史標記前人在此的產業活動。其生活中的地景（包括家屋、田園、作物及伯公祠等）歷經四代人的經營，不僅對此地景的感知具有一脈相承的熟悉經驗，也可以藉由這種類同的感知經驗記憶起過去在此土地上活動的父祖先人。如同 Lye 研究 Batek 人如何記憶過去一樣，強調以身體實踐的方式記得過去（例如回到過去祖先走過的路徑）；也如同 Richard Nelson 探討阿拉斯加的 Koyukon 人，提及在世者如何透過已逝者遺留的帳棚及其周遭環境，來感受已逝者過去的活動故事（轉譯自 Ingold 2000: 148）。Ingold 指出這種相同的感知（*sensibility*），是建

立在對此土地與居民的親密的熟悉度上。同理可知，陳家五代人在永興上大窩的活動歷史具有一脈相承的經驗與體驗，透過報導人記憶的地景及其敘說過去的生計活動，我們可以理解他感知到父祖輩的工作與經驗，他也認知到他曾祖父以來在家園土地上活動所留下的痕跡。無怪乎 Ingold 說：「記憶可以話語、物件及工具來鍛造，然而這些均是生活在土地上某種方式的果實。」更重要的，「生活不只是記憶的對象，以口述傳統再現及傳承，生活也是一種記憶實踐，鑲嵌在對周遭環境的感知（*perception*）之上」（同上引）。

三、地景與認同

誠如 Stewart 及 Strathern（2003：3）所揭示的，生活在社會地景內的人們以所擁有的文化知識決定他們所建構的（地景）圖像，而民族誌學者致力於從人們表述的訊息中努力詮釋其內容。前文提及北四村的文化地圖提供筆者探討獅潭地景的重要線索，此處筆者將用以結合探討地景與認同的關係，主要分成地方認同、家的認同與族群認同三個部份。

大致說來，獅潭北四村村民繪製的家鄉素描多數呈現家屋所在位置及其附近環境，包括知名旅遊景點、地方公共建築與歷史地點等內容，因此臺三線公路及其他村落道路成為素描中標示地點的主要地理座標，反而村落中的自然山林景觀被忽略了。無怪乎楊長鎮在其主持的村史計畫的研究報告中指出，村民的家鄉素描令人驚覺「獅潭人不再親山了」：

獅潭溪兩側支流窩壩裡頭的紅瓦屋已經十室九空，山林荒廢、水旱田都休耕，伯公多半也被迫跟著移往坑口近省道的大伯公合署辦公。老人在畫紙上留下了紙湖、紙寮、腦寮、

香茅寮、石灰窯、涼亭、埤、圳等各種營建物地點，至於窩、勢、排、坑、潭、壁、石、嶼、峒、崑、崆、崁小地名更幾乎可以填滿地圖；不難想見，山林曾經密佈他們的足跡，獅潭，曾經，是三度空間裡升降開展的草木蟲獸和血汗勞動，但卻漸漸被時代壓縮成南北一線，沿著逐年拓寬的省道，先是鄉人溪水般外流，省道一拓寬，今日則成了旅人疾馳而過的無名風景。（1999：110）

的確，筆者所接觸的獅潭人往往以臺三線公路的精確里數做為認知地點的方式，或是位於哪一條產業道路的那一個方向，公路建築已成為居民認知家鄉地景的依據，獅潭眾多的山巒、水潭、陸橋、樹木、石頭或其他自然地景，反而很少出現在三十歲以下年輕人的生活中，所以當筆者詢問他們過去的山林產業地點或具有窩、勢、排、潭等自然地景的地點，大多無法得到答案，可見獅潭地景的認知已出現世代差異。事實上認知與理解地景有多種不同的方式，如同理解刻劃在地景上的社會記憶與意義也有許多方式一樣，而地景的再現是文化決定的，依據的角度是誰在「觀看」（Smith 2003：72）。村民描繪的家鄉素描是一種地景的再現方式，儘管是透過個別作者的角度呈現出來，可以是個人認為重要的村落地景或歷史古蹟景點，也可以是個人熟悉的生活地點與居家環境，因此這些文化地圖所再現的地景與一般地圖製作的形式與意義不盡相同。值得注意的是，由村人的畫作看來，家的想像與地方印象多以生活經驗為中心，表現為與日常生活相關的家屋、道路、公廟、伯公祠、公共建築等，呈現地景認知與日常生活的密切關係。

由於十餘年前村史計畫的推動，村民不僅以筆描繪出家鄉的文化地圖，也透過討論的方式，列舉出村內各小聚落的老地名與各小地名，讓知道的人提醒大家所指涉的地點位置，並敘說地名的由來與背

後的歷史故事，共同激盪村人對村落土地的理解，進一步形塑村人共同的地方歷史記憶。筆者認為經過這個過程也可以加強村人與村落地景的關係，深化村人共同的地方認同。更重要的，當老人們用紙筆畫出過去製紙產業的石灰窯與紙湖地點；另有一群人實際勘查遺留在地表上的石灰窯與紙湖（楊長鎮 1999：110-111），經過實地尋訪產業遺跡的地點，地景上刻寫的產業記憶被重新挖掘出來。當年的窯場工人引領著村史勘查隊，踏著過往生命經驗的軌跡，逐步拼湊起記憶中的石灰窯與紙湖地點；而參與探訪的獅潭人，在石灰窯與紙湖遺跡出土的剎那，聯繫上老人們與過去工人的地方記憶，重新認識家鄉的過往產業，也對家鄉地景有進一步的理解與認同。十餘年前製作文化地圖與村史勘查活動生動地呈現地景與記憶的聯繫方式，一方面地景不僅是實地刻劃著過去產業的記憶，另一方面理解地景背後的故事可以透過繪畫實踐的方式，也可以用實地尋訪的方式來拼湊記憶。在找尋記憶與形塑共同記憶的過程中，地景不僅可以做為記憶地方的實際地標，也可以成為凝聚地方認同的一種象徵。然而，無可否認的，十餘年前的村史運動所形塑的集體記憶與地方認同，似乎也隨著老輩凋零與年輕人的向外遷移而逐漸褪色，筆者的地景訪查已清楚呈現世代的差別，今日大部份年輕人的目光集中在繁華的都市生活，獅潭山林鄉野的寧靜似乎已留不住年輕沸騰的理想。雖然獅潭似乎成為老一輩人退休安居的翠谷仙境，或是托育稚齡子女的家園，但在一片追逐熱鬧繁華的潮流中，寧靜的山林家園偶而也可以成為年輕世代舒壓的避難所（如同筆者常見到在地年輕人假日回鄉或帶著朋友回家度假一樣），可見獅潭山林故鄉仍是他們認同的家的一部份。

以本文探討的十九幅素描而言，大部份村民的家鄉地圖均以自家的家屋為中心，再逐步描繪家屋附近的地景，包括道路、橋樑、伯公祠壇、公廟、公共建築及鄰家等，呈現以自家為中心的生活領域，不僅清楚描繪家的空間環境與座標位置，也描繪相關的社會關係。有的

甚至描繪居家附近的地景特徵，例如地震的影響、過去山林的生活經驗、過去的產業生計，或是鄰近的祠廟神壇等等。這樣的構圖大多呈現以家為中心的想法，自然成為每一個人最熟悉的場景，如前文所述，描繪個人熟悉的地景往往出於日常的生活經驗與記憶，個別的家當然是最直接的目標，也是最能呈現其認同情感的淵源。就此而言，家鄉素描透過個人對家的深厚情感與生活經驗，將人與地景的關係緊密地聯繫起來，可以說，家的認同清楚地維繫人與地景的緊密關係。

儘管如此，獅潭人與地景的關係仍存在錯置（displacement）的弔詭現象，即便是在地的家的認同也不例外。筆者曾經詢問圖 18. 的作畫人有關其素描作品想要表達內容，起初年過七十的他記不得有過這件事情，後來看到我拍攝的素描作品，他才想起那是畫他的紙湖老家。原來目前位於臺三線公路旁的商店是他退伍後才經營的事業，他的老家在百壽村第八鄰伯公祠附近。儘管他在永興村已經落籍五十餘年，他製作的薑汁花生糖也是遠近馳名的地方美味，但他表示還是懷念小時候成長的老家。雖然商店與老家距離不遠，也同屬於北獅潭的範圍，但這位先生說為了生活才住到臺三線旁經商，否則他不會離開山林中幽靜的老家，他還是打算未來退休後可以回去老家居住養老。我訝異於報導人的理想居住空間還是依存於山林溪畔的舊時老家，顯現獅潭老一輩人與自然地景親近的本色，儘管臺三線旁的商店為寬敞的樓房建築，也是報導人生計的主要來源，他所認同的還是貼近自然地景的老家空間。

其次，另一個人與地景的錯置現象是原住民對家的認同問題存在想像與實際的差異。目前百壽村的原住民新村約有三十多戶的賽夏族住民，約在民國七十八、七十九年從山上部落搬進新村居住。不過，目前仍有賽夏人居住在原部落內，如圳頭社兩戶、崩山下社兩戶、馬陵社四戶。根據張瑞恭（1988：82-84）的研究，當初新村興建計畫因為主事者不夠積極，不斷更改方案，致使新村建案由民國七十一年

開始，直到民國七十七年才確定由民間營造商承包興建。²⁶遷村計畫延宕多年，造成嚴重的問題，賽夏人質疑公部門的政策執行力，多存有反抗情緒。民國七十五年已經有十戶賽夏人從舊部落遷移到百壽聚落，向客家人租屋居住，新村建案的延宕也造成他們心理與經濟上的損失。筆者在二十多年後訪談新村住戶，所有的賽夏報導人都提到新村內酗酒嚴重的問題，很多人表示，當初他們願意從較高山上部落遷到較低的丘陵新村，²⁷完全是因為交通便利的考量，有利於子弟上學與就業，但是沒想到反而促成了酗酒的嚴重問題，同時伴隨著族人失業、婚姻與各種家庭問題，許多人均給予新村生活負面的評價。事實上有些賽夏人很想回到山上部落去生活，理由有三：一為過去生活在山上，山林田園等工作就在家屋附近，十分方便，現在反而需要有交通工具上山去工作，成為有些族人不工作的藉口。²⁸其次，過去賽夏各部落之間有一段距離，往往是逢有需要或節慶時節才會互相拜訪，飲酒慶賀，現在的新村將大家集中在一起，促成某些人天天一起喝酒，更不想工作。其三，山上視野佳、空氣好，不像現在新村的二層樓連棟建築，空間狹隘，加上房子的風水地理不好（詳下文），對族人發展不佳。由此可見原住民一方面適應變遷到山下生活，另一方面又陷入對傳統部落空間的失落感。筆者的訪談發現，賽夏人對今日族人處境與問題常存在兩極的看法。儘管大部份賽夏人居住在新村之內，他們的田園山產仍在山上，由於此區屬於明德水庫的上源保留區，原住民原有的山林財產不能任意開發，凡有關植樹伐木、竹林與薑園的開發都需依照一定的規定申請辦理，複雜的政策與申請的繁文縟節常

²⁶ 民國七十七年由民間營造商承包的建案，改建坪為 36 至 40 坪，可向國宅科貸款五十萬元，以二十年低利貸款付費，當時願意遷村的賽夏人有 19 戶。參考張瑞恭 1988：82。

²⁷ 賽夏三社的平均海拔高度為 400-450M，位於百壽隧道附近的原住民新村海拔高度約 200M。

²⁸ 張瑞恭（1988：83）即指出，遷村新村後還是得返回舊宅工作，留下老弱婦孺在新村會滋生問題。此外與客家人為鄰的新村生活將會帶給賽夏人更多的文化接觸與文化調適上的困難與問題。

招致原住民的抱怨。過去各部落家系的境域分明，族人之間存有禮尚往來的關係，今日普遍感到族人之間呈現四分五裂的現象，關係不睦尤以選舉前後最為明顯。特別的是，受到漢人觀念的影響，他們相信新村的風水不好，不但沒有帶給他們新的希望，反而帶來更多的問題。當筆者詢問新村風水不佳的理由，多數人表示新村不僅個別家屋空間狹隘，更重要的是，新村與對山客家人的宏化宮隔溪相望，整體視線受阻、看不遠。筆者曾與原住民朋友同遊永興國小舊址，原來的校舍已毀於九二一地震，後來學校遷往山下，舊校址改為紀念公園。²⁹ 賽夏朋友對公園的寬廣視野讚嘆不已，直說舊校址的風水極佳，難怪過去可以培育許多人才。相形之下，原住民新村呈現的是擁擠的空間與受限的視野，不難理解賽夏人所感受到的壓迫感。Bloch (1995) 探討非洲馬達加斯加島 Zafimaniry 的地景觀念，強調「清晰」(clarity) 概念是其文化中的價值，也以此概念來看待地景。³⁰ 本文雖無法證明賽夏人的地景概念為何，但賽夏人強調視線寬廣不受阻礙似乎是其中的要點。簡言之，近三十多年來百壽賽夏人大多經歷了從山上到山下的兩個世界，擺盪在維持廣闊山林的生計活動與適應新村狹隘生活空間的兩極，乃形成部份賽夏人住在新村、卻心繫舊部落的矛盾。

圖 3、8、16、17 為賽夏人所描繪的家鄉素描，其中圖 3 描繪作畫人與客家人混居的百壽村八鄰地景，畫作與一般客家人的素描類似，除了標示作者的家屋之外，也畫出新舊派出所、宏化宮現址與舊址、伯公祠與永興國小舊址，比較特別的是呈現作者的源出地「馬陵（鄰）社大河」的匯流處。圖 17 勾勒出舊部落馬陵社的老家，顯示

²⁹ 今日永興國小已經遷到臺三線旁百壽與永興兩村的交界處。

³⁰ Zafimaniry 的土地被視為恆久不變，人的生命卻無法如土地般恆久。男女在婚姻關係建立之後開始建造家屋，並隨著家庭的發展，使家屋的建材結構日趨堅固，其中以柱子象徵男主人，爐灶象徵女主人，並在死亡之後維持著此象徵意義。村外的立石代表已逝先人，被當做兄弟姊妹般的聯繫來紀念（不同於夫妻所維繫的家系）。透過儀式實踐將人的生命聯繫於橫久不變的土地，使成為恆常不變的土地的一部份。參見 Bloch 1995。

住在新村卻心繫山上舊家園的情愫。圖 16.將原住民新村、賽夏活動中心、及對面的宏化宮並列，呈現新村的生活環境。而圖 8.則捨棄精確比例與個別家屋，將整個百壽村客家與賽夏的聚落統合在山林、溪流與道路的架構中，是所有家鄉素描畫作中最具寬廣視野的一幅作品。這四幅賽夏作品沒有呈現共同的交集，雖然其中三幅都提及賽夏三社的名字，但每一幅的重點不同（例如呈現三社位置地點、馬陵社老家與馬陵（麟）社大河），反而表現出個別的地景關懷與認同。尤其對比於圖 16.所表現的內容，似乎以當今原住民新村與共同的集會所做為賽夏人新的認同焦點，特別是與客家宏化宮並列，表面上並不特別強調原客族群的界線，但事實上與其他三幅的賽夏作品一樣，均能在畫紙上找到賽夏人所認同的社名或地景標的，而這些賽夏社名完全不見於客家人的畫作。由此可見，賽夏人對家與地方的認同不完全等同於客家人的觀點，尤其北四村的範圍過去均為賽夏人的活動領域，原住民的地方今日已被建設成漢人客家聚落，原住民對家鄉與地方的認同也只能由其舊部落社名表現出來，呈現歷史更迭中族群領域的消長與原住民的失落感與無奈。

有關賽夏地景的認知與記憶，誠如胡家瑜（2009：356）的研究指出：「賽夏並不強調運用固定的地方或特定的地景，做為連結過去記憶的主要焦點。更動態地，賽夏社會的集體記憶，經常藉由可移動的器物或可複製的具體行動，延伸傳遞。」筆者探訪百壽賽夏人的地景與認同，發現很難找出一般公認的代表賽夏的歷史地點或特定地景，儘管今日具有共同的原住民新村與集會所，但凝聚認同的功能相當有限。今日新村內的賽夏人缺乏和諧的氣氛，只有 145 人的原住民社群充滿不同派系的對立與緊張關係。³¹可以說這裡的賽夏人表現在地景上的認同關懷，雖然存在對比於客家人的不同觀點，並有原住民

³¹ 根據苗栗縣獅潭鄉戶政事務所 2011 年 6 月底的人口統計資料，百壽村的原住民人口只有 145 人（上網日期：2011/07/01）。

強調自身的族群認同，但一些與客家人有通婚關係的原住民往往徘徊於原客之間的模糊認同。對於家與地方的認同，此地賽夏人表現明顯的內部差異，有人擺盪在山上與山下的兩個地景世界，有人強調需面對強勢漢文化的剝奪與影響，也有人強調族群融合與客家化的生活。

四、結論

本文嘗試由記憶與生活經驗探討人與地景的關係，從而理解人對地景的感知與地景上的文化建構，筆者企圖採取以行動者為主的居住觀點，強調人與地景互動的實際過程與經歷，從個別行動者的經驗與一般共同的生活經驗，進一步探討地景與形塑家的認同、地方認同、與族群認同等關係。

本文以筆者研究的獅潭北四村為範圍，地景論述多集中於永興村與百壽村的田野調查，並輔以 1998 年村民所繪製的家鄉文化地圖做分析與詮釋。本文發現客家族群對於地景記憶保存許多過去開墾時代的老地名，以及過去山林產業的遺跡，成為村人認識地方歷史的憑藉，不過對於這些歷史景點的實際位置，因與今日大部份村人的生活沒有太大的關連，而呈現世代差異及逐漸被年輕世代遺忘的現象。相對地，賽夏原住民即使已經由舊部落遷移至今日新村，他們對各自所屬的舊社與山上的家園山林仍有清楚的概念，甚至常常上山工作，保持與其土地的緊密聯繫關係。其次，就地景與生活經驗來看，影響村民生活最明顯的是拓寬後的省道臺三線公路，它不僅是獅潭人認知家園方位的地理座標，也呈現獅潭人對商業發展的落空與承受噪音的後果。地景與獅潭人的生活經驗息息相關，不僅過去地震的記憶刻寫在地景上，山林工作的足跡是村民最津津樂道的故事記憶，甚至發生在地景上的事件也成為判斷吉地或凶地的依據。以居住觀點的角度，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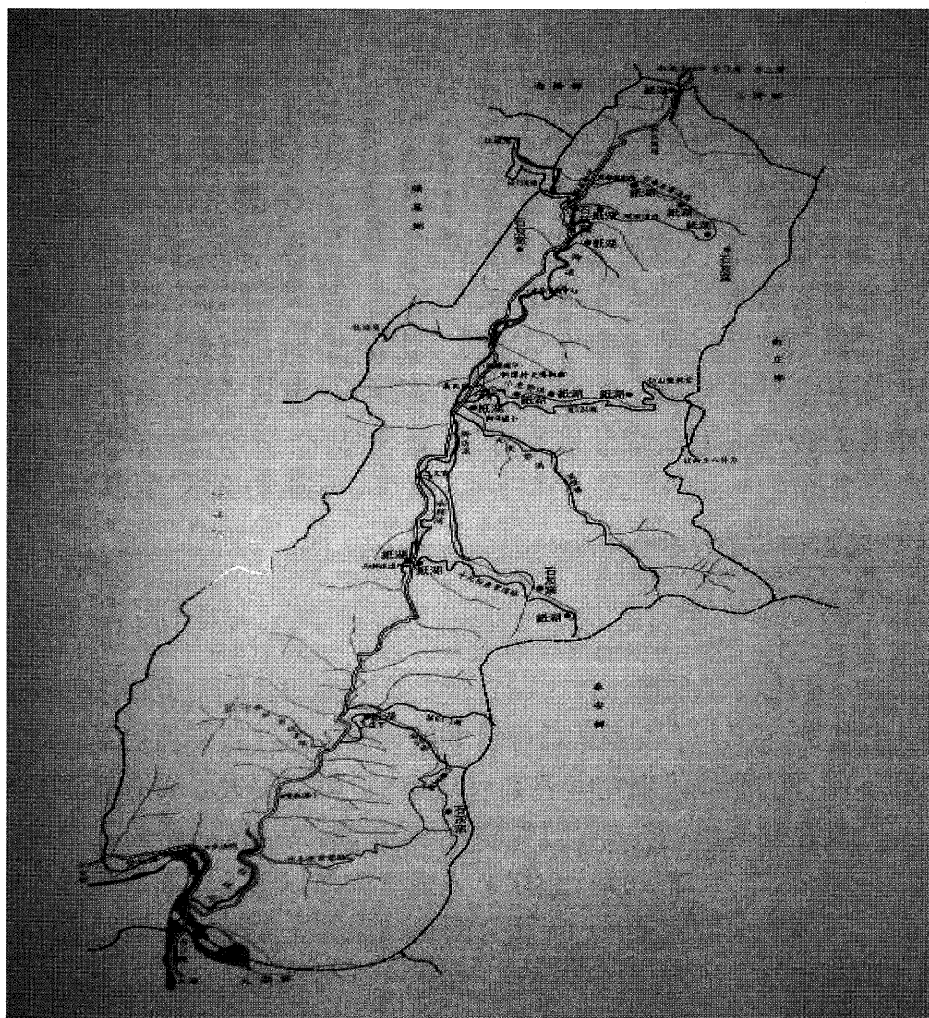
者試圖呈現報導人對其家園、景物與人事的感知，從而體驗代代相傳的生命勞動經驗與地景遺跡的關係。由於一般客家人看重陰宅與陽宅的風水，無怪乎當地義民廟的風水地理會被視為獅潭人口外流的原因。而儘管大多數人家必須遷就土地環境的限制，但風水概念仍然是選址與改善既有空間的依據。漢人的風水觀念也影響賽夏新村的住民，原住民將族人發展與社群內部的矛盾問題歸咎於風水不佳的後果，一方面呈現接受漢文化的觀念與習俗，另一方面也隱含對公部門的批評以及對強勢漢文化的無言抗議。

筆者透過村民描繪的家鄉文化地圖，進一步詮釋人與地景的關係。無可否認的，透過十餘年前的村史活動，不僅喚醒獅潭人對當地歷史地景的記憶，也進一步形塑集體的共同記憶。筆者從一些作畫人的訪談探究畫者所理解與感知的地景意義，發現畫紙上的作品不僅印證了地景與地方認同的關係，地圖上的地標呈現了畫者對家的濃郁情感與認同，而且家鄉素描也表現了畫者的族群背景與認同的議題。同時筆者也發現認同之外的人與土地的錯置現象，例如家的想像往往與實際不相符合，無論是對山林生活的嚮往，還是對傳統文化的緬懷，畫紙上呈現的地景呈現作畫人更多的遐想空間，甚至隱含著作者的情感、認同意識與對抗情緒。

事實上村落的自然地景影響著獅潭人的社會關係，近年來的社會變遷與人口外移的影響，村人對自然景觀的認知著重於道路地標的設置。賽夏原住民為了交通與就學就業的考量，從各自的舊社部落共同遷移至山下的原住民新村與客家人為鄰，不料卻喪失了傳統部落的地方認同與寬闊視野，形成今日受限於狹隘的新村空間與嚴重的酗酒問題。這個改變再次說明漢人自以武力進墾獅潭以來，逐漸奠定漢人在此區的經濟優勢與統治地位，長久因襲的漢文化優勢與欠缺反思的結果，似乎也注定了原住民與客家之間的不平等關係。

附錄一：北獅潭紙湖與石灰窯分佈圖（照片）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楊長鎮主編，2002，《苗栗文獻：獅潭的山林與地景》，第二十一期，改版季刊第七期。頁 32。苗栗縣文化局。



圖版：

資料來源：獅潭村史博物館，作者拍攝。每幅素描均有作者的簽名及聯絡地址與電話，為保護圖畫作者的隱私，筆者將地址與電話資料刪除。

圖 1. 永興村公館、獅頭潭、獅象橋。作者：黃章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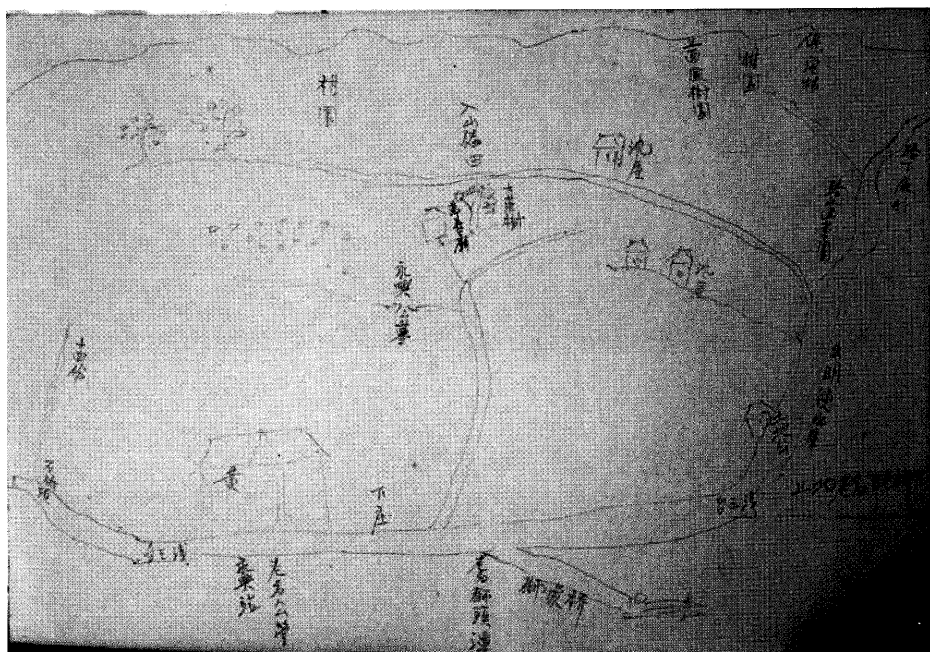


圖 2. 和興村吊石、殺番凸地點。作者：苗炎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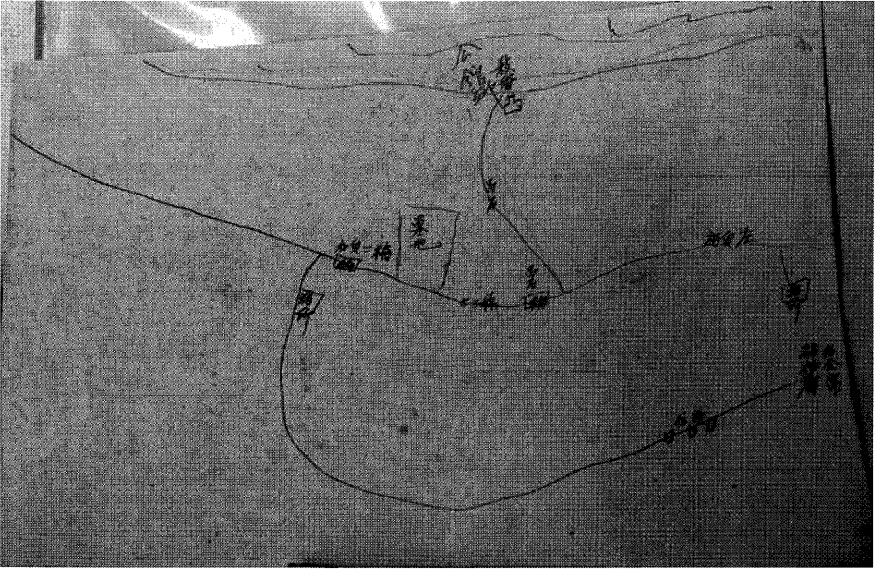


圖 3. 百壽村第八鄰地景。作者：豆子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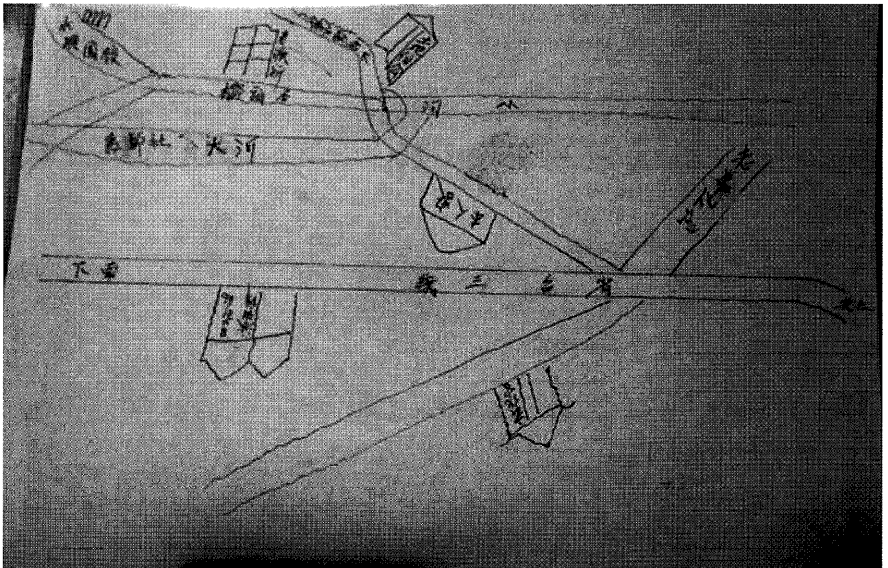


圖 4. 和興村地景。作者：傅維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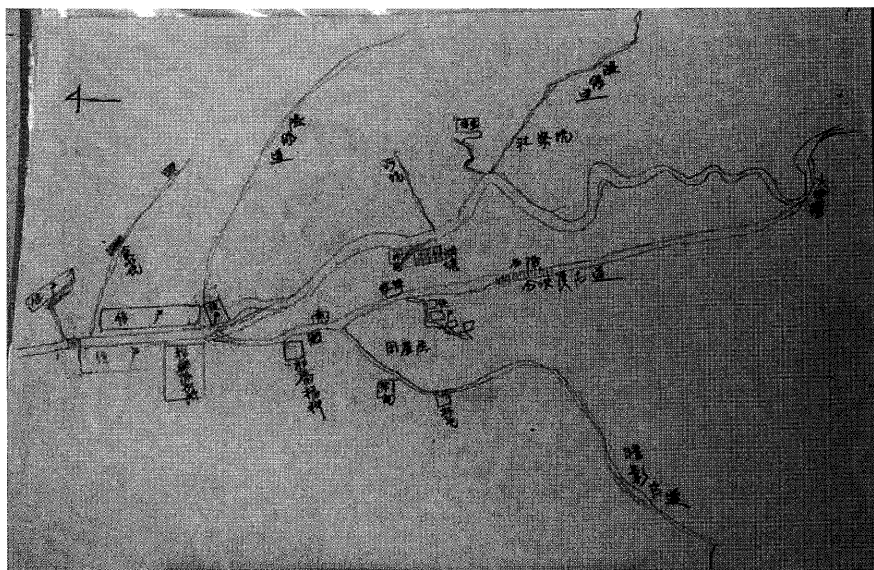


圖 5. 新店村十六份庄地景。作者：溫春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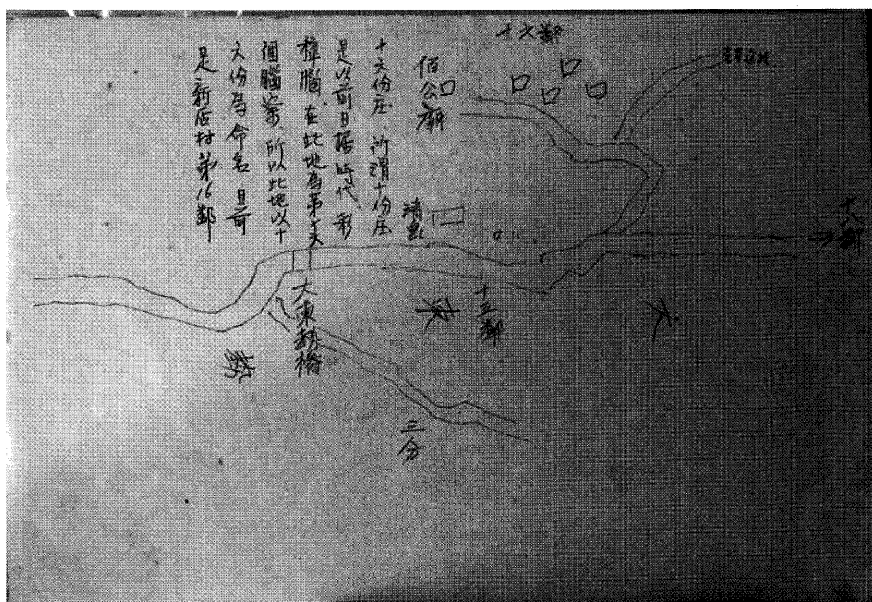


圖 6. 新店村三份坑。作者：謝雙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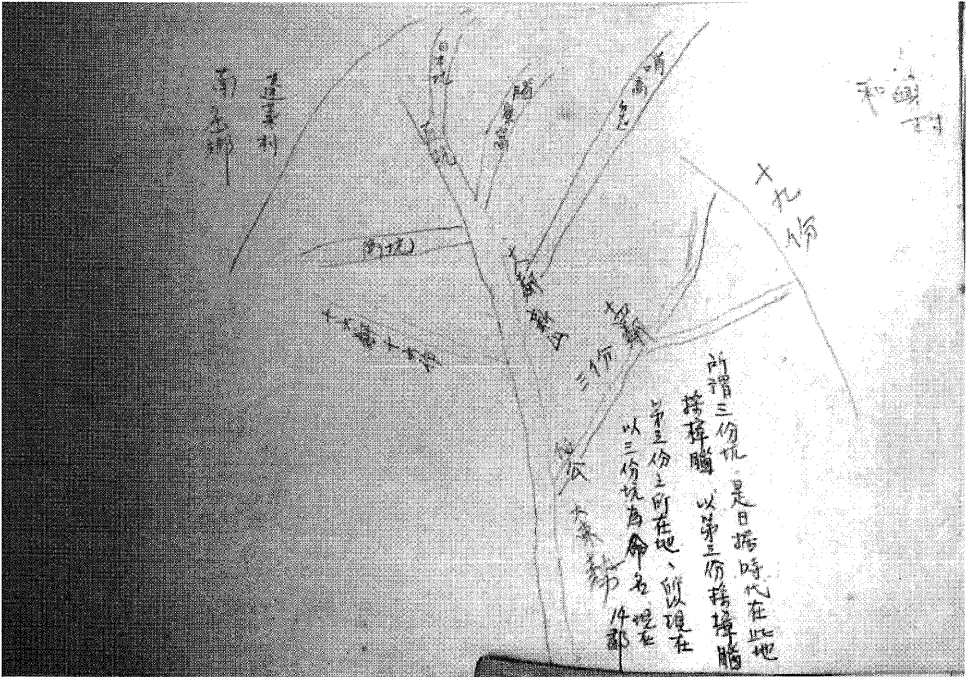


圖 7. 和興村舊臺三線與湖塘地點。作者：傅金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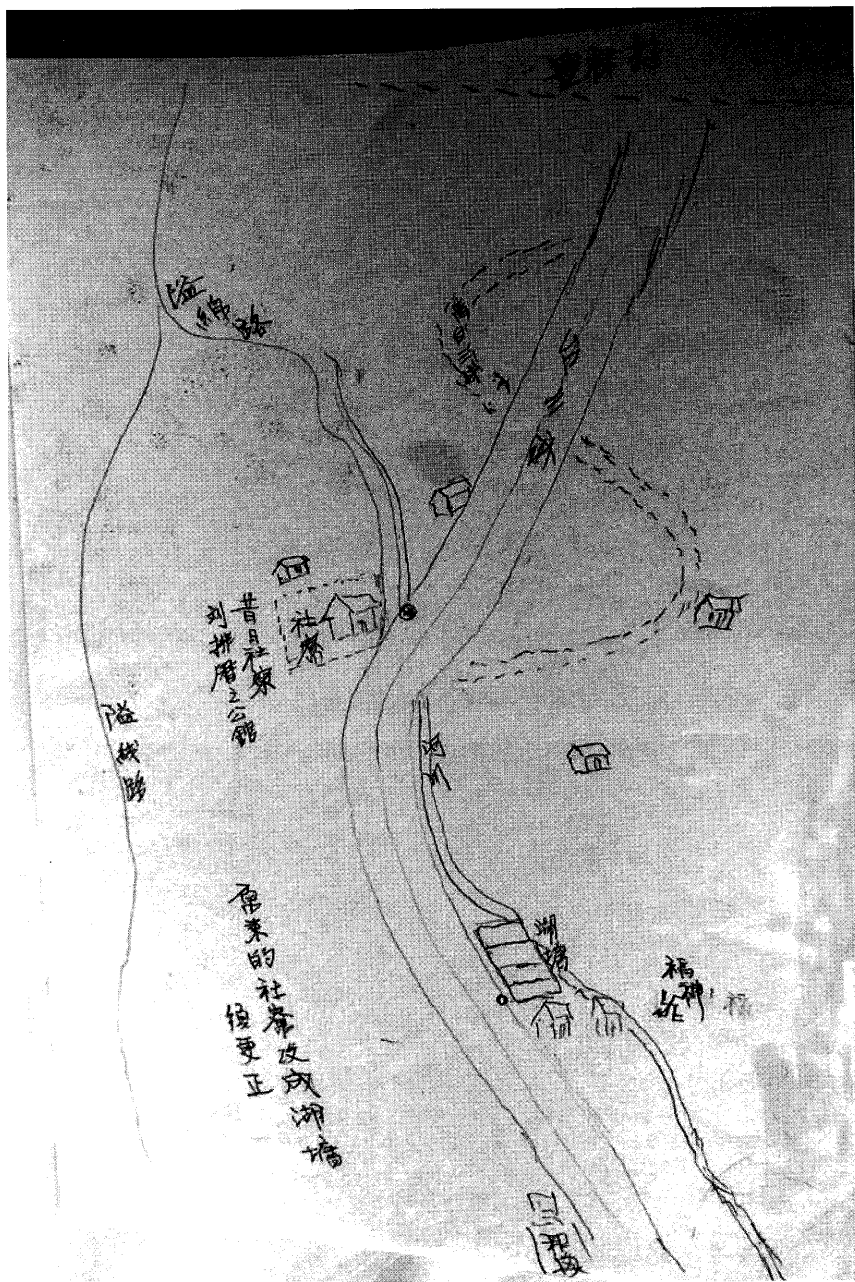


圖 8. 百壽村地景與賽夏三社。作者：豆鼎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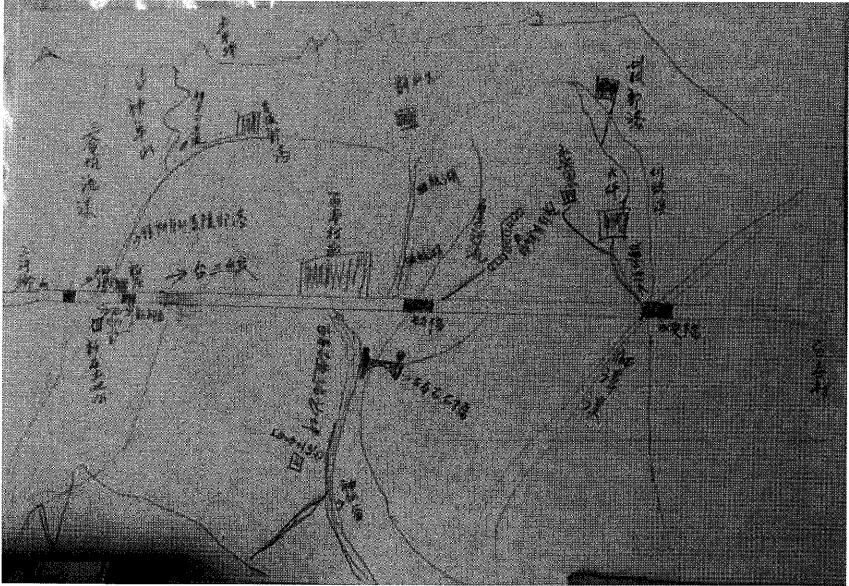


圖 9. 百壽村新舊台三線公路。作者：房紹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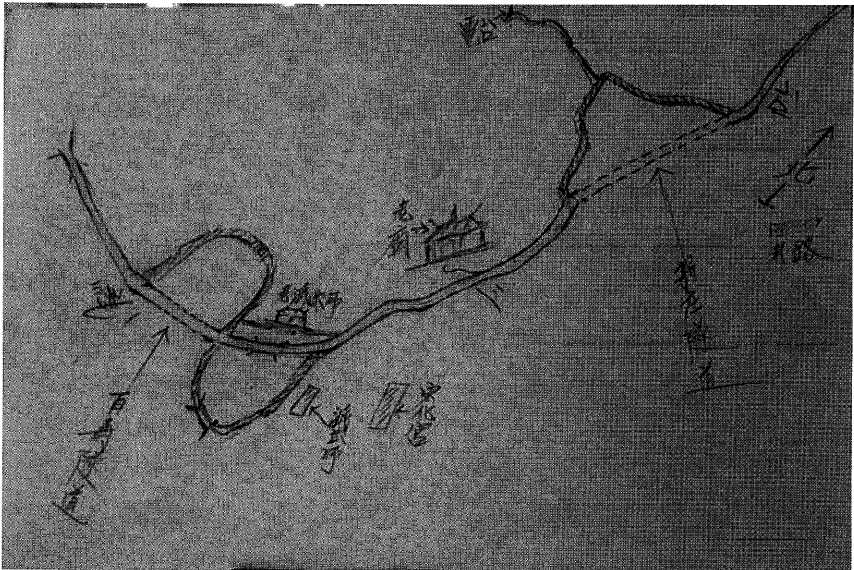


圖 11. 永興村六份庄。作者：涂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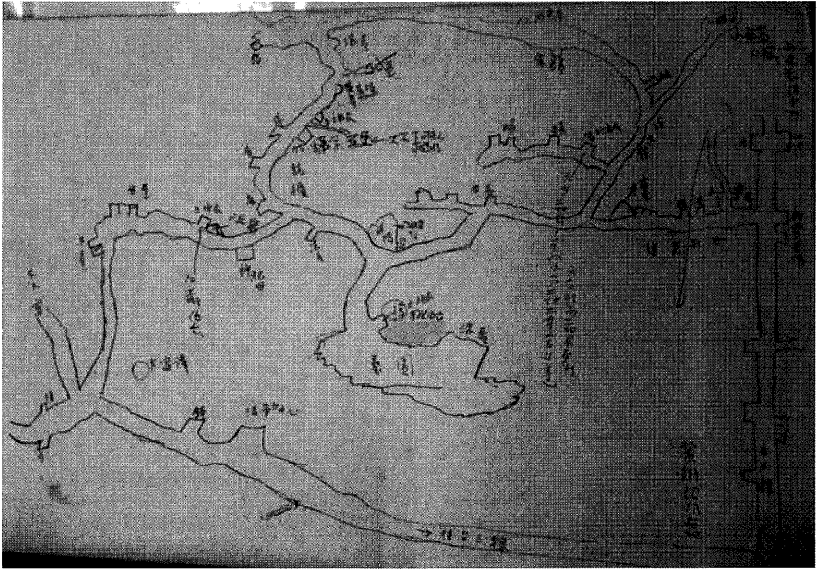


圖 12. 永興村關刀山地震之影響。作者：黃榮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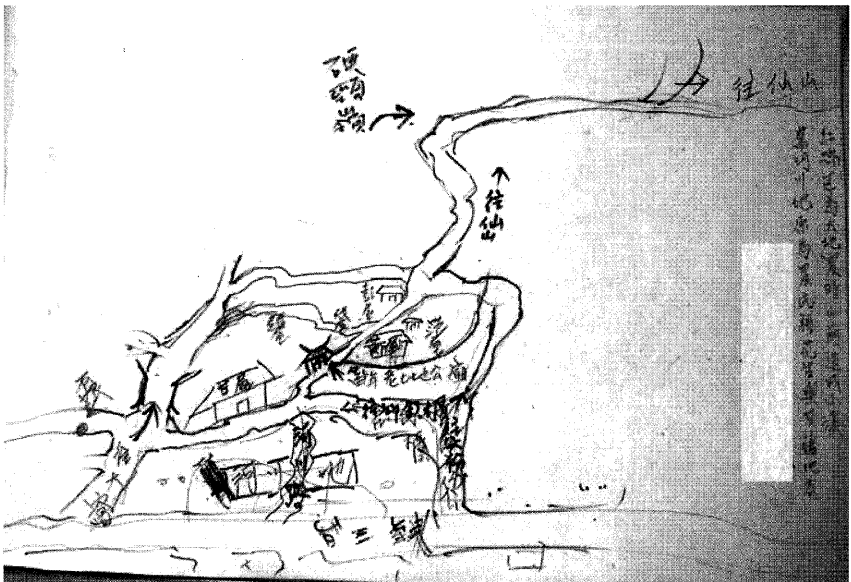


圖 13. 永興村關刀山地震突出之地之一。作者：黃慶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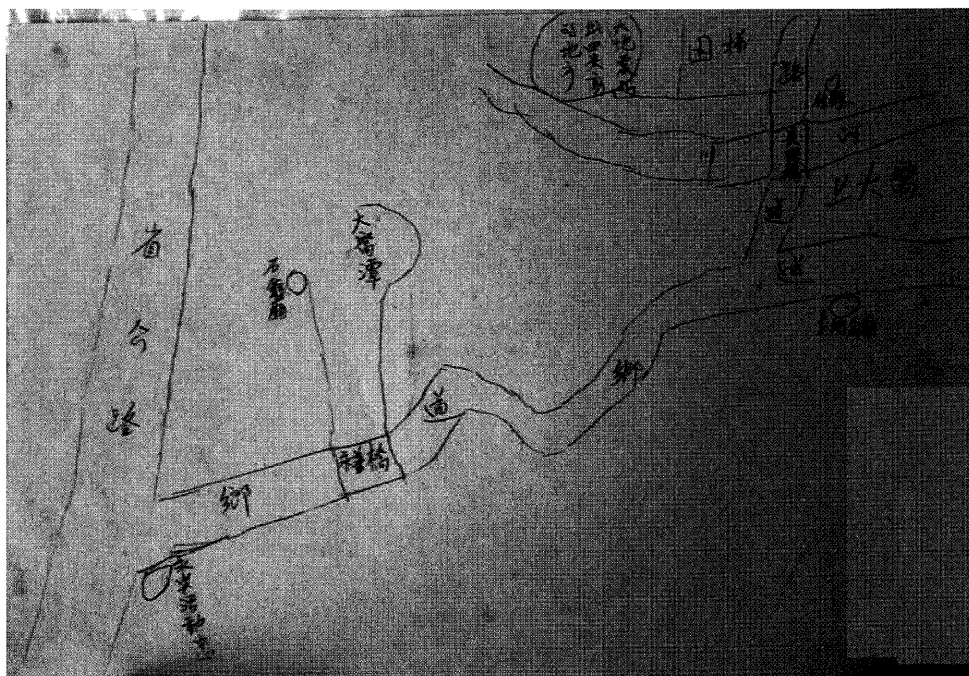


圖 15. 永興村伐木與木馬道故事。作者：練木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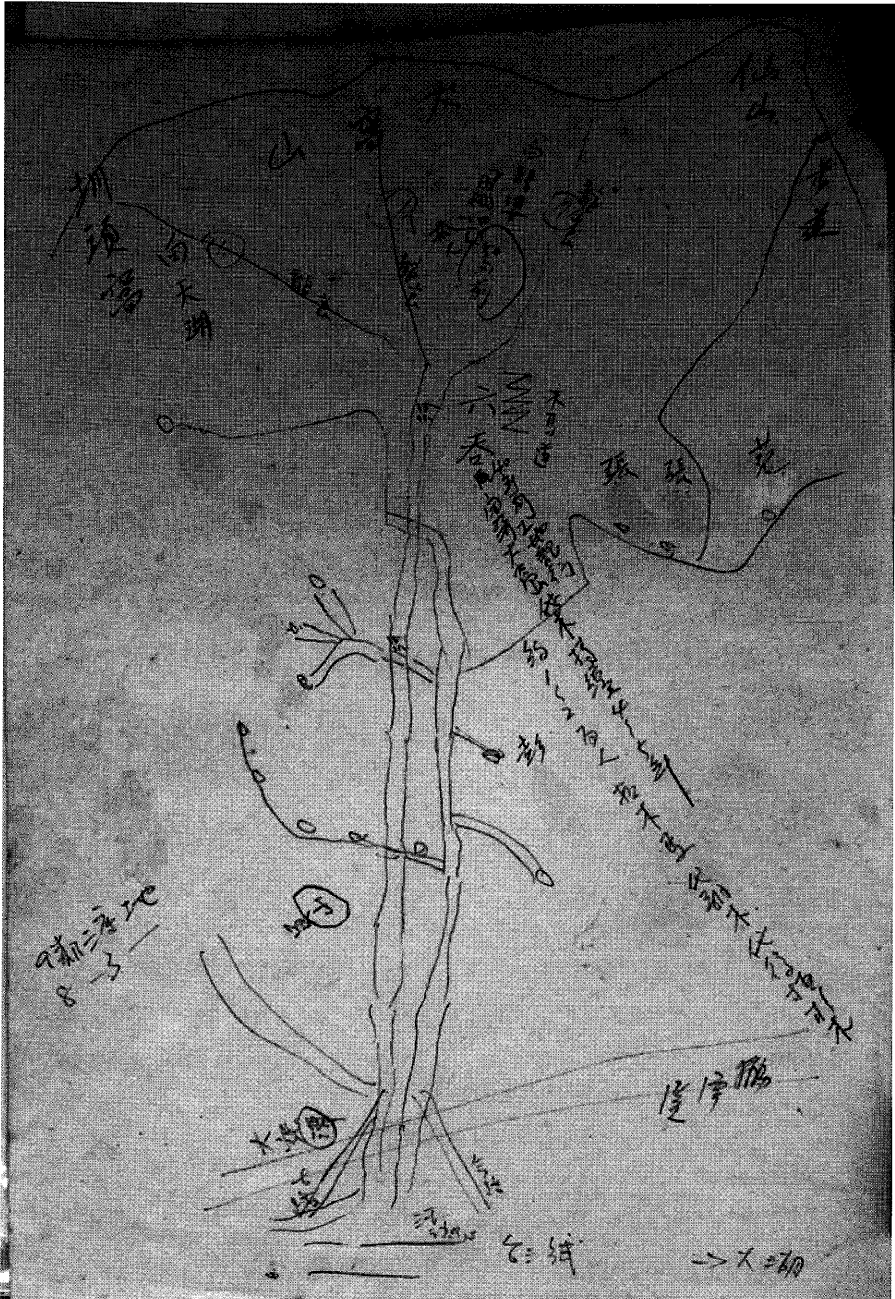


圖 16. 百壽村原住民新村。作者：黃珠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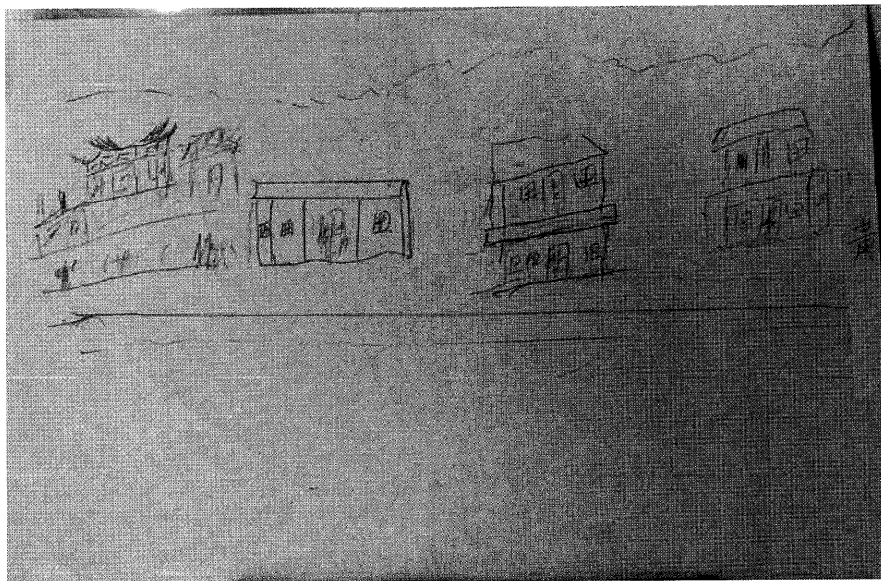


圖 17. 百壽村馬陵社老家。作者：豆潘登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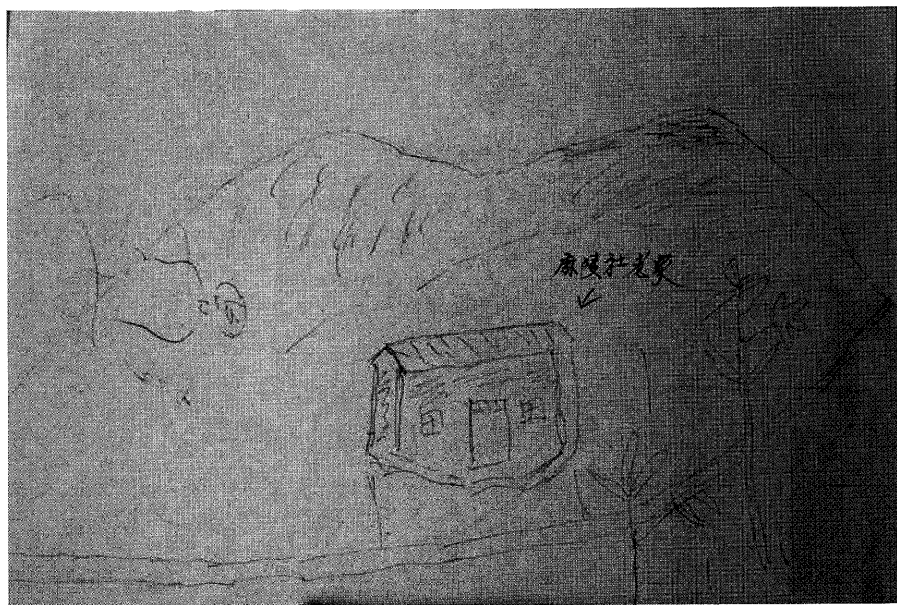


圖 18. 百壽老家的記憶。作者：黃章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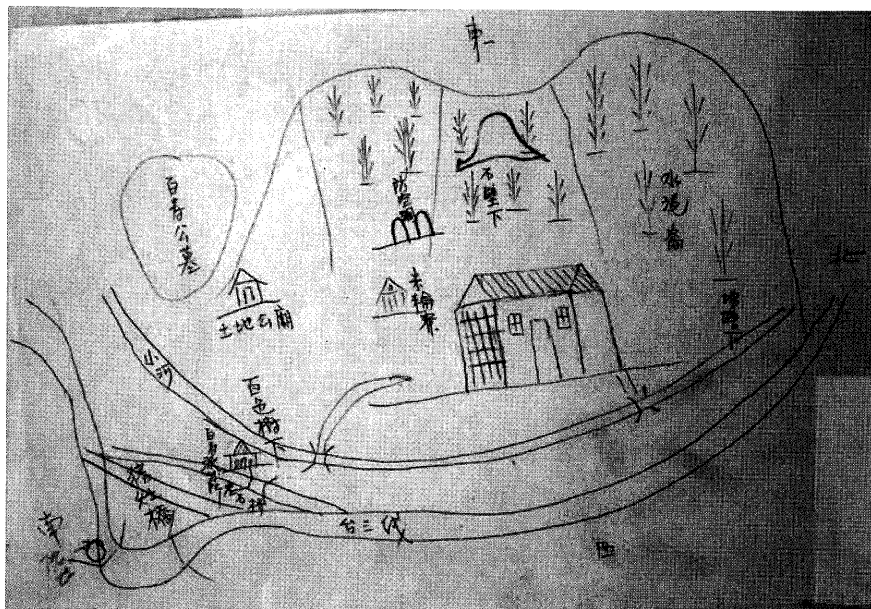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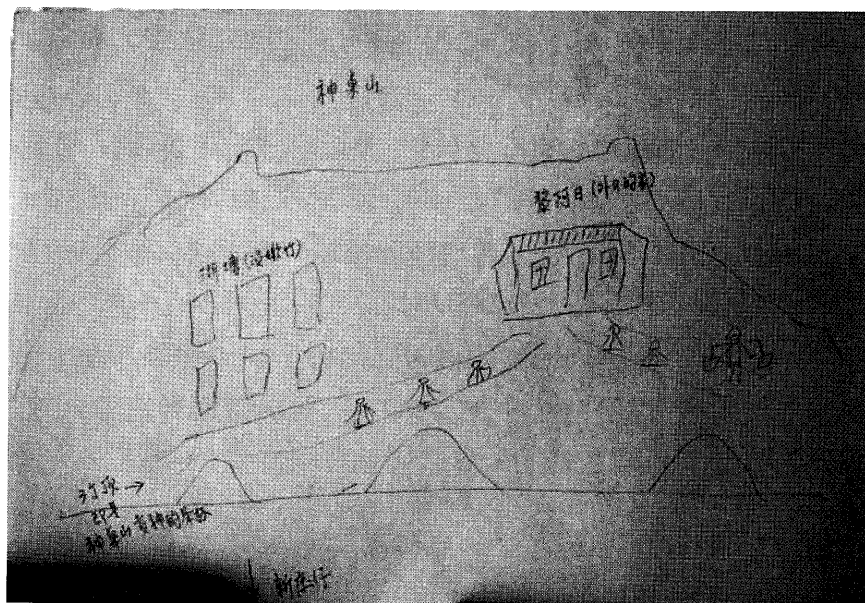


圖 19. 神桌山的茶杯與湖塘。作者：黎桂香



參考書目

- 王世慶，1972，〈民間信仰在不同祖籍移民的鄉村之歷史〉。《臺灣文獻》23(3): 3-38。
- 王學新，2003，《日據時期竹苗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與研究》。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呂玫媛，2010，〈祭祀組織與地方社群之形成：苗栗獅潭北四村的初步考察〉。收錄於《客家的形成與變遷》，莊英章、簡美玲主編，上冊，頁 361-404。新竹：國立交通大學。
- 林開世，2003，〈風景的形成和文明的建立：十九世紀宜蘭的個案〉。《臺灣人類學刊》1(2): 1-38。
- _____，2007，〈風水作為一種空間的實踐：一個人類學的反思〉。《臺灣人類學刊》5(2): 63-122。
- 林瑋嬪，2009，〈風水寶地的出現：移民與地方再造〉。頁 299-334，收錄於黃應貴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之意象、實踐與社會的生產》。臺北：漢學研究中心。
- 林聖欽，2004，〈獅潭鄉〉。頁 605-660，收錄於施添福等編撰，《臺灣地名辭書》，第十八章，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胡家瑜，2000，〈器物、視覺溝通與社會記憶：賽夏儀式器物初探〉。《臺大考古人類學刊》55: 113-141。
- _____，2009，〈從移動的空間到轉變的地景：對於賽夏社會變動性與穩定性的另類思考〉。頁 335-362，收錄於黃應貴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之意象、實踐與社會的生產》。臺北：漢學研究中心。

- 胡家瑜、林欣宜，2003，〈南庄地區開發與賽夏族群邊界的再檢視〉。
《臺大文史哲學報》59: 177-214。
- 苗栗新故鄉協會，2002，〈獅潭的山林與地景〉。頁 6-12，收錄於楊長鎮主編，《苗栗文獻：獅潭的山林與地景》，第二十一期，改版季刊第七期。苗栗：苗栗縣文化局。
- 苗栗新故鄉協會，2002，〈賽夏氏族的山林經營〉。頁 13-24，收錄於楊長鎮主編，《苗栗文獻：獅潭的山林與地景》，第二十一期，改版季刊第七期。苗栗：苗栗縣文化局。
- 苗栗新故鄉協會，2002，〈會社與竹林〉。頁 25-31，收錄於楊長鎮主編，《苗栗文獻：獅潭的山林與地景》，第二十一期，改版季刊第七期。苗栗：苗栗縣文化局。
- 苗栗新故鄉協會，2002，〈發現紙湖與石灰窯〉。頁 32-36，收錄於楊長鎮主編，《苗栗文獻：獅潭的山林與地景》，第二十一期，改版季刊第七期。苗栗：苗栗縣文化局。
- 苗栗新故鄉協會，2002，〈獅潭林業的美麗與哀愁〉。頁 37-40，收錄於楊長鎮主編，《苗栗文獻：獅潭的山林與地景》，第二十一期，改版季刊第七期。苗栗：苗栗縣文化局。
- 苗栗新故鄉協會，2002，〈獅潭縱谷的溪流與圳排〉。頁 46-50，收錄於楊長鎮主編，《苗栗文獻：獅潭的山林與地景》，第二十一期，改版季刊第七期。苗栗：苗栗縣文化局。
- 苗栗新故鄉協會，2002，〈賽夏頭目黃阿添〉。頁 6-12，收錄於楊長鎮主編，《苗栗文獻：獅潭的山林與地景》，第二十一期，改版季刊第七期。苗栗：苗栗縣文化局。
- 黃卓權，1988，〈從獅潭山區的拓墾看晚清臺灣內山墾務的演變〉。頁 103-131，收錄於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編，《臺灣史研究論文集》。臺北：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

- _____，2004，《跨時代的臺灣貨殖家：黃南球先生年譜（1840-1919）》。臺北：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
- _____，2006，〈獅潭山區的拓墾：客家人與原住民的勢力消長〉。頁 603-627，收錄於林修澈編，《賽夏學概論》。苗栗：苗栗縣文化局。
- 黃應貴，1995a，〈導論〉。頁 1-38，收錄於黃應貴主編，《空間、力與社會》。臺北：南港中研院民族所。
- _____，1995b，〈土地、家與聚落：東埔社布農人的空間現象〉。頁 73-132，收錄於黃應貴主編，《空間、力與社會》。臺北：南港中研院民族所。
- 黃應貴主編，2009，《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之意象、實踐與社會的生產》。臺北：漢學研究中心。
- 曾桂龍編，1996，《獅潭鄉志》。苗栗：獅潭鄉公所。
- 葉春榮，1995，〈風水與空間：一個臺灣農村的考察〉。頁 317-350，收錄於黃應貴主編，《空間、力與社會》。臺北：南港中研院民族所。
- _____，1999，〈風水與報應：一個臺灣農村的例子〉。《中研院民族所集刊》88: 233-257。
- 張瑞恭，1988，〈賽夏族社會文化變遷的研究：紙湖、向天湖社群的探討〉。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碩士論文。
- 楊長鎮，1999，《獅潭溪流域的故事：一個民眾參與的村史運動》期末報告書。臺北：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在地族群文化工作室。
- 楊長鎮主編，2002，《苗栗文獻：獅潭的山林與地景》，第二十一期，改版季刊第七期。苗栗：苗栗縣文化局。（其中許多文章由苗栗新故鄉協會撰寫）

- Bender, Barbara, 2002, "Time and Landscape". *Current Anthropology* 43(4):103-112.
- Bender, Barbara, eds. 1993, *Landscape: Politics and Perspectives*. Providence, Oxford: Berg.
- Bender, Barbara and Margot Winer eds., 2001, *Contested Landscapes: Movement, Exile and Place*. Oxford, New York: Berg.
- Bloch, Maurice, 1995, "People into Place: Zafimaniry Concepts of Clarity". Pp. 63-77, in *The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Perspectives on Place and Space*. Eric Hirsch and Michael O'Hanlon e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ubaker, Rogers, 2004, *Ethnicity Without Groups*. Boston: Harvard College Press.
- David, Bruno and Meredith Wilson eds., 2002, *Inscribed Landscapes: Marking and Making Plac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Harper, Janice, 2003, "Memories of Ancestry in the Forest of Madagascar". Pp.89-107, in *Landscape, Memory and History: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Pamela Stewart and Andrew Strathern eds. London: Pluto Press.
- Hirsch, Eric and O'Hanlon, Michael, eds., 1995, *The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Perspectives on Place and Spa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Ingold, Tim, 1993, "The Temporality of the landscape." *World Archaeology: Conceptions of Time and Ancient Society*, 25(2): 152-174.
- _____, 2000, "Building, Dwelling, Living: How Animal And People

Make Themselves at Home in the World”. Pp. 172-188 in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 by Tim Ingo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_____, 2000, “Ancestry, generation, substance, memory, land”. Pp. 132-151, In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 by Tim Ingo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Küchler, Susanne, 1993, “Landscape as Memory: The Mapping of Process and Its Representation in a Melanesian Society”. Pp. 85-106 in *Landscape: Politics and Perspectives*. Barbara Bender ed.. Oxford: Berg Publisher.

Low, Setha M. and Denise Lawrence-Zuniga eds., 2003, *The Anthropology of Space and Place: Locating Culture*. Blackwell Publishing Company.

Mitchell, W. J. T., 1994, *Landscape and Pow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O’Hanlon, Michael and Frankland, Linda, 2003, “Co-present Landscape: Routes and Rootedness as Sources of Identity in Highlands New Guinea”. Pp.166-188 in *Landscape, Memory and History: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Pamela Stewart and Andrew Strathern . London: Pluto Press.

Santos-Granero, Fernando, 1998, “Writing History into the Landscape: Space, Myth, and Ritual in Contemporary Amazonia”. *American Ethnologist*, 25(2): 128-148.

Smith, Angele, 2003, “Landscape Representation: Place and Identi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Ordnance Survey Maps of Ireland”. Pp. 71-88

in *Landscape, Memory and History: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Pamela Stewart and Andrew Strathern eds., London: Pluto Press.

Stewart, Pamela and Andrew Strathern, 2003, "Introduction". Pp.1-15 in *Landscape, Memory and History: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Pamela Stewart and Andrew Strathern. London: Pluto Press.

_____, 2005, "Cosmology, Resources, and Landscape: Agencies of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in Duna, PapuaNew Guinea". *Ethnology*, 44(1): 35-47.

Stewart, Pamela and Andrew Strathern eds., 2003, *Landscape, Memory and History: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Pluto Press.

Thomas, Julian, 1993, "The Politics of Vision and the Archaeologies of Landscape". Pp. 19-48 in *Landscape: Politics and Perspectives*. Edited by Barbara Bender. Oxford: Berg Publishers.

Thomas, Philip, 2002, "The River, the Road, and the Rural-Urban Divide: A Postcolonial Moral Geography from Southeast Madagascar". *American Ethnologist*, 29(2): 366-391.

呂玫媛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30013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

meihuanlu2010@gmail.com